

適時審判請求權於 民事程序上之侵害與救濟* —— 試論民事法院遲延審判之國家賠償責任

陳瑋佑**

摘要

適時審判請求權作為憲法所保障之程序基本權的內涵之一，我國實務、學說咸認其侵害應予以救濟。然而，相對於實體基本權的侵害必須被確保接近使用法院之機會，於法院未尊重程序基本權的情形，當事人是否亦能主張該項權利，不無疑問。如肯定之，由於適時審判請求權受侵害一事，原則上並不生影響於裁判之正確性，且已經產生的遲延結果亦無法透過重新、迅速之審判加以矯正，故可能的救濟途徑只有事前的預防與事後的彌補機制。在此基礎上，必須探討我國民事程序法是否及如何藉由不作為抗告制度之承認、我國國家賠償法之解釋適用，而能有效救濟法院審判之遲延。鑑於基本人權的普世性，本文乃主要借鏡歐洲人權法院就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的應用及德國法上就法院遲延審判的國家責任之發展，試論我國法解釋論上的應有之道。

* 投稿日：2016年10月11日；接受刊登日：2017年6月28日。〔責任校對：張幼文〕。

作者衷心感謝匿名審稿人之批評與指教，使本文更加完整，惟文責當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穩定網址：<http://publication.ias.sinica.edu.tw/91100181.pdf>。



關鍵詞：適時審判請求權、基本權侵害之救濟、司法不法之國家（賠償）責任、審判法官特權、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

目次

壹、導論	三、法院遲延審判的國家賠償責任與審判法官特權
一、程序基本權概論	參、國家賠償責任因法院遲延審判之成立與效果
二、問題之提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與救濟	一、法院就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的不法侵害
貳、法院遲延審判的救濟必要性及其手段	二、法院審判遲延的可歸責性
一、訴訟權就法院侵害程序基本權之防衛機能	三、法院審判遲延的損害賠償
二、法院遲延審判的程序上救濟可能	四、法院遲延審判之國家賠償責任的請求程序
	肆、結論

壹、導論

一、程序基本權概論

程序基本權係獨立於個別實體基本權（materielle Grundrechte）之基本人權一事¹，為我國憲法第16條所明認（「訴訟

¹ 參見 Arnd Uhle, Rechtsstaatliche Prozessgrundrechte und -grundsätze, in: Merten/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d. V, 2013, § 129 Rn. 10；關於個別實體基本權之程序保障功能，參見 Matthias Herdegen,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Stand: 70. EL 2013, Art. 1 Abs. 3 Rn. 20；許宗力，基本權程序保障功能的最新發展——評司法院釋字第四八八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54期，頁154-155（1999年）。

權」)²，且於外國法（如：德國基本法³、法國憲法⁴）或國際法（如：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及第13條、歐盟基本權憲章第47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2條及第14條）上存在廣泛之共識。此一主觀權利（本文之粗體字均為筆者所強調，以下同）一方面要求國家必須提供司法給付以救濟受憲法或法律所保障之權利的侵害⁵，而能有效實現該等實體權利⁶，另一方面不允許使用審判制度之人淪為程序的客體而遭受國家的恣意支配⁷。亦即，其係一個以前階段的接近使用法院權與後階段的公正程序請求權為核心，而能直接對國家（法院）主張之基本權⁸。此外，從客

- 2 因此，程序基本權在我國無疑具獨立基本權之地位，參見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3版，頁285-286（2004年）；許志雄等合著，現代憲法論，4版，頁229-230（2008年）；法治斌、董保城，憲法新論，5版，頁284-285（2012年）。
- 3 在德國，除基本法上個別程序權保障之規定外（同法第19條第4項、第101條、第103條第1項），聯邦憲法法院向來以同法第2條第1項（一般自由權）及第20條第3項（法治國原則）為基礎肯定一般司法給付請求權（Justizgewährungsanspruch）及公正程序請求權（Anspruch auf ein faires Gerichtsverfahren），參見 *Udo Di Fabio*,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Stand: 70. EL 2013, Art. 2 Rn. 72.
- 4 在法國，公正程序請求權（droit à un procès équitable）雖未規定於憲法文本，惟憲法委員會明確承認接近使用法院權（droit d'accès à un tribunal）、防禦權（droits de la défense）及無罪推定係屬憲法原則或憲法上之基本權，參見 *IDOUX (P.), MILANO (L.)*, Aspects du droit à un procès équitable, *Juris-Classeur Libertés*, Fasc. 1520, 2007, n° 33.
- 5 參見 *FRICERO (N.)*, Garanties de nature procédurale: équité publicité, célérité et laïcité, in *GUINCHARD (S.)*, *Droit et pratique de la procédure civile. Droits interne et droit de l'Union européenne*, 7^e éd., Paris, Dalloz, 2012, n° 21.11; *Andreas Voßkuhle/Anna-Bettina Kaiser*, Grundwissen – Öffentliches Recht: Der allgemeine Justizgewährungsanspruch, *JuS* 2014, S. 312 (313).
- 6 參見 *Franz C. Mayer*, in: *Karpenstein/Mayer (Hrs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EMRK, 2. Aufl., 2015, Art. 6 Rn. 1; *Herdegen (Fn. 1)*, Art. 1 Abs. 3 Rn. 15; 法治斌、董保城（註2），頁284：「權利救濟請求權，即屬憲法所保障的程序性的基本權利，用以確保實體上基本權的實現」；司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理由書：「此種司法上受益權，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利，且實質上亦須使個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
- 7 *Mayer (Fn. 6)*, Art. 6 Rn. 39; *Dieter Leipold*, in: *Stein/Jonas (Hrsg.)*, Kommentar zur Zivilprozessordnung, Bd. III, 22. Aufl., 2005, Vor § 128 Rn. 130.
- 8 *Uhle (Fn. 1)*, § 129 Rn. 11 a.E.; *Wolfgang Brehm*, in: *Stein/Jonas (Hrsg.)*, Kommentar zur Zivilprozessordnung, Bd. I, 23. Aufl., 2014, Einl. Rn. 186: 「[基本法]所包含的

觀面向而言，賦予使用法院制度的權利一事，係屬國家獨占權力、禁止自力救濟的必要補償⁹，而相對應的公正程序建置則可以從法治國原則對於國家（司法）權力運作的組織及程序所設立之指標中導出¹⁰，一個實效的權利保護機制正是法治國家的必要內涵¹¹；因此，歐洲人權法院早於1979年*Sunday Times*案中，著眼於歐洲人權公約之確保，強調反映法治國原則之程序基本權保障（同公約第6條）具有關鍵地位¹²，並於*Airey*案中將內含於法治國原則的公正程序保障定位為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¹³。

訴訟權具有主觀基本權之性質且法治國原則在客觀上亦指向其保障，已如上述。在此法理基礎上，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憲法對於公正程序的具體要求為何？就此，除應確保人民接近使用法院之權利外¹⁴，所謂程序公正性（即：有效實現權利保護、禁止當事人淪為程序客體）之個別內涵尚有：法院組織上之審判獨立、法官中立（我國憲法第80條、第81條）、法定法官¹⁵、程序之公開¹⁶、審判

程序基本權直接對訴訟之進行發生效力」；BVerfG, NJW 2007, 499 (Rn. 51)，本裁判肯定在欠缺法律明文規定的情形，公正程序請求權有其填補漏洞之功能。

9 參見Eberhard Schmidt-Aßmann,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Stand: 70. EL 2013, Art. 19 Abs. 4 Rn. 16; Brehm (Fn. 8), Einl. Rn. 284；許志雄等合著（註2），頁230。

10 參見Bernd Grzeszick,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I, Stand: 70. EL 2013, Art. 20, VII Rn. 129 ff.；許育典，憲法，6版，頁68-70（2013年）。

11 IDOUX (P.), MILANO (L.), (註4), n° 1; Helmuth Schulze-Fielitz, in: Dreier (Hrsg.), GG Kommentar, Bd. II, 2. Aufl., 2006, Art. 20 Rn. 211.

12 *Sunday Times v. The United Kingdom*, 30 Eur. Ct. H.R. (ser. A) at 36 (1979).

13 *Airey v. Ireland*, 32 Eur. Ct. H.R. (ser. A) (1979).

14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81號解釋理由書：「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司法院釋字第587號解釋理由書、司法院釋字第418號解釋理由書；姜世明，民事程序法發展之憲法因素考量，收於：民事程序法之發展與憲法原則，2版，頁46-48（2009年）。

15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理由書：「……法院案件之分配不容恣意操控，應為法治國家所依循之憲法原則。我國憲法基於訴訟權保障及法官依法獨立審判，亦有相同之意旨……」；姜世明（註14），頁12-13。

16 不認為其係屬憲法位階者：沈冠伶，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

期間之適時¹⁷、當事人間之武器平等¹⁸、聽審請求權之保障¹⁹、法安定性、當事人程序主體地位之尊重與法院恣意之防免等²⁰。此項訴訟權保障體系，不僅係我國釋憲實務所肯認者²¹，亦符合2009年底於我國生效之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²²及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²³之規範內容。而關於後二國際人權法文件，應指出者有二：第一，公政公約在我國雖僅具法律位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以下簡稱：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惟縱不基於其所具填補、擴充基本權規範之意義（我國憲法第22條）²⁴，或尊重國際條約的基本方針（同法第141

「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收於：訴訟權保障與裁判外紛爭處理，2版，頁6註11（2012年）；保留見解：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修訂5版，頁27註9（2016年）。

- 17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530號解釋理由書；沈冠伶，民事訴訟之適時審判與案件管理，收於：程序保障與當事人，頁60（2012年）；姜世明（註14），頁33。
- 18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65號解釋理由書；姜世明，民事程序之武器平等原則，收於：民事程序法之發展與憲法原則，2版，頁167-168（2009年）。
- 19 參見沈冠伶（註16），頁11；姜世明（註14），頁29-31。
- 20 *Jens Meyer-Ladewig*,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3. Aufl., 2011, Art. 6 Rn. 90 f.:「法治國原則的一個重要面向係法安定性……參與者不得成為程序之客體，而必須是主體且有適當的參與影響權限一事，亦係公正程序原則之核心內涵。」
- 21 司法院釋字第482號解釋理由書：「所謂訴訟權，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上之平等權等」。
- 22 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人人向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法院得因民主社會之風化、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關係，或於保護當事人私生活有此必要時，或因情形特殊公開審判勢必影響司法而在其認為絕對必要之限度內，禁止新聞界及公眾旁聽審判程序之全部或一部；但除保護少年有此必要，或事關婚姻爭執或子女監護問題外，刑事民事之判決應一律公開宣示。」
- 23 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任何人就其民事權利或義務之爭訟或對刑事起訴皆有權要求在獨立、中立且法定之法院前受公正、公開且於適當期間內之審判。判決應公開宣示之；法院得因民主社會之風化、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關係，或於保護當事人私生活或為青少年之利益有此必要時，或因情形特殊公開審判勢必影響司法而在其認為絕對必要之限度內，禁止新聞界及公眾旁聽審判程序之全部或一部。」
- 24 廖福特，法院應否及如何適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台灣法學雜誌，163

條)²⁵，而承認公約相對於內國法之優先適用性²⁶；至少就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而言，內國法院應透過法律解釋（含：法之續造）以避免內國法與公約之（水平）衝突所可能招致不能實現公約所具體保障之訴訟權的後果，而維持法秩序之一體性²⁷，在此限度內，可謂存在一個內國法律（含：實體法、程序法）之「合公約解釋」（konventionskonforme Auslegung）原則²⁸。第二，鑑於國際人權法與我國憲法之「匯流」趨勢²⁹，就我國程序基本權保障之內容建構與具體實踐而言，自不宜忽視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及歐洲人權

期，頁52（2010年），氏並認為內國法抵觸公政公約時，應以後者為特別法，優先適用之，廖福特（同註），頁65。

- 25 關於我國依系爭憲法條文肯定國際公約具有優先於內國法律之效力的學說、實務見解，參見黃昭元，國際公法課程基準的檢討與反思：國際法法源、國際法與內國法關係，台灣法學雜誌，181期，頁63-65（特別是該文註10、註12）（2011年）；不同見解：李建良，論國際條約的國內法效力與法位階定序——國際條約與憲法解釋之關係的基礎課題，收於：廖福特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八）（上冊），頁219-227（2014年）。
- 26 在我國，公政公約雖於2009年3月31日受立法院批准，其批准書則未受聯合國秘書長准予存放，惟此項未能交付批准書的瑕疵（公政公約第48條第2款、第49條）仍因進一步制定施行法的立法程序，使我國單方接受公約之義務，而產生國際法上的自我拘束力，參見黃昭元，2014年憲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44卷特刊，頁1414-1415（2015年）；廖福特（註24），頁45。若然，則不能否認公政公約係屬司法院釋字第329號解釋所稱之「條約」，而有適用憲法第141條之餘地；保留見解：王自雄，人權兩公約之國內法化暨其施行法之實施——從國際法的內化與人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之法律地位論起，台灣法學雜誌，164期，頁117（2010年）。
- 27 關於同位階規範相競合或衝突時之法律解釋原則，參見 *Tristan Barczak*, Normenkonkurrenz und Normenkollision, JuS 2015, S. 969 (975).
- 28 同旨：孫迺翊，無障礙／可及性、合理調整與平等不歧視原則：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我國憲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平等原則內涵，臺大法學論叢，45卷特刊，頁1212-1213（2016年）；亦參見 *Theodor Schilling*, Internationaler Menschenrechtsschutz, 2. Aufl., 2010, Rn. 40; BVerfG, NJW 2004, 3407 (unter I.1); FRICERO (N.), (註5), n° 21.19, 氏指出，法國實務上多有藉由歐洲人權公約及公政公約補充內國法明文規定之欠缺、提供進一步保障或制裁違反行為之見解。
- 29 參見張文貞，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匯流——兼論我國大法官解釋之實踐，收於：廖福特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上冊），頁246-267（2009年）；我國大法官解釋中曾援引歐洲人權公約者，如：司法院釋字第392號、第582號、第710號解釋。

法院裁判之參考價值³⁰，而應透過「比較法解釋」(rechtsvergleichende Auslegung)方法，影響我國憲法第16條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解釋適用³¹。^{31a}

二、問題之提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與救濟

於我國憲法第16條(及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³²)所保障之程序基本權的諸多具體面向(上述壹、一)中，本文關心者係：法治國原則對於民事程序(含：財產權事件、家事事件、債務清理事件等)制度之「適時審判要求」或民事程序當事人(含：關係人)之「適時審判請求權」；至於同一原則及基本權在刑事程序上的適用及

30 依照統計，歐洲人權法院於2009年所作的1,625個裁判中，涉及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者高達57%，可證明其實際上具有重大意義，*Meyer-Ladewig* (Fn. 20), Art. 6 Rn. 1.

31 參見林明昕，基本國策之規範效力及其對社會正義之影響，*臺大法學論叢*，45卷特刊，頁1348-1349(2016年)；關於(憲法、法律)「比較法解釋」方法，參見*Uwe Kischel, Rechtsvergleichung*, 2015, § 2 Rn. 60 ff.

31a 應附言者係：我國法律位階之規範相對於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所謂的「合公約解釋」及相對於憲法第16條的「合憲性解釋」兩者，在法學方法論上固然有其不同意義，亦即，「合憲性解釋」一方面更具有選擇解釋結果之「優先規則」(Vorrangregel)性質，另一方面得要求「法之續造」以避免法律規定之違憲性，參見 *Claus-Wilhelm Canaris,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und Rechtsfortbildung im System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nlehre*, in: Grigoleit/Neuner (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 2012, S. 581 (586 ff., 594 ff.)；關於「體系解釋」： *Bernd Rüthers/Christian Fischer/Axel Birk, Rechtstheorie*, 8. Aufl., 2015, Rn. 770 ff.，惟由於本文認為我國憲法第16條、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與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之保障內容應屬相同(亦參下述壹、二末段)，故在此限度內，前揭兩種解釋方法之運用尚不立於審稿意見所(正確地)指出之「緊張關係」。

32 必須強調的是：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雖未如同條第3項第3款，針對刑事程序明定迅速受審之要求，惟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在 *Munoz v. Peru*, Communication No. 203/1986, U.N. Doc. CCPR/C/34/D/203/1986 (1988), <http://hrlibrary.umn.edu/undocs/session34/203-1986.html>. 等案中擴張此項要求於非刑事程序上，而確認其亦屬該條第1項所謂「公正程序」之內涵，參見 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RC), General Comment no. 32, Article 14, Right to Equality before Courts and Tribunals and to Fair Trial, para. 27, U.N. Doc. CCPR/C/GC/32 (23 Aug. 2007), at <http://www.refworld.org/docid/478b2b2f2.html>.

效力，則因刑事與民事程序間一定程度之差異性³³，並不屬本文討論之範疇。就此，憲法應確保審判之適時性的理由在於：第一，法安定性之要求，蓋依照法治國原則，法院程序不僅應確保尋求救濟之人獲得實效之權利保護，亦必須使法律爭議在適當期間內得到解決，以確立法安定性³⁴；第二，保護當事人實體、程序利益之要求，蓋對於程序當事人而言，正義的遲延等同正義的拒絕（justice delayed, justice denied），此並得從遲延審判得造成系爭實體利益之減損及系爭外財產權、自由權之喪失的角度加以解說³⁵。因此，在立法上，國家一方面必須以適時解決紛爭為指標，設計程序制度（如：期日指定規範、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失權制裁等）³⁶，此時，由於迅速裁判之要求與程序公正性之其他面向（如：就訟爭標的為事實及法律上充分審查之要求³⁷）往往互相衝突，而應承認

33 例如：刑事初審法院之有罪判決得被定性為對人民權利的「初次侵害」，而應肯定被判決有罪的刑事被告，原則上有就該判決受上級審審查的權利，參見許宗力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574號解釋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第一點、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理由書（段碼5、7）、歐洲人權公約第7議定書第2條；又如：因為刑事追訴的迅速性有助於嚇阻犯罪效果之提升、國家刑罰權之實現、確定或排除被告之犯罪嫌疑等意義，應對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01條為合憲性解釋，或能認為最高法院發回更審的次數僅以一次為限，參見潘怡宏，論最高法院反覆發回更審實務之違憲問題，台灣法學雜誌，207期，頁72-101（2012年），並且，基於刑事審判制度的該等特徵，我國2010年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即明定刑事審判之遲延得構成減刑事由。

34 BVerfG, NJW 1993, 1635 (unter II.1); Grzeszick (Fn. 10), Art. 20, VII Rn. 139; 沈冠伶（註16），頁7。

35 邱聯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一），頁103（2015年）；許士宦，民事訴訟上之適時審判請求權，收於：審判對象與適時審判，頁8-9（2006年）；同旨：FRICERO (N.), (註5), n° 212.121; Marten Breuer, Staatshaftung für judikatives Unrecht, 2011, S. 322 f.; 關於德國通說、實務見解均肯定審判「實效權利保護請求權」(Anspruch auf effektiven/wirkungsvollen Rechtsschutz)之內涵及於審判之適時性，參見沈冠伶（註16），頁9-10；姜世明（註14），頁31-34；Uhle (Fn. 1), § 129 Rn. 64.

36 我國法上的詳細解說（從程序利益保護之觀點）：邱聯恭，程序利益保護原則，收於：程序利益保護論，頁10-45（2005年）；許士宦（註35），頁14以下。

37 參見BVerfG, NJW 1981, 39 (unter II.1.a)；此亦係德國法上「實效權利保護請求權」之內涵。

立法者有相當之形成自由³⁸，仍不得對尋求救濟者之系爭實體權造成不符比例之限制³⁹；另一方面，在實踐上，行使司法權之法院雖依法享有指揮、管理程序之裁量權（如：選擇準備主要期日辯論之方式、為闡明處置）⁴⁰，惟應視個案狀況採取促進程序之措施，並且，依照程序遲延之程度，該裁量空間尚可能減縮至零⁴¹，無論如何，縱使欠缺程序法上的一般性（如：法國法院組織法第L. 111-3條、我國家事事件法第1條）或個別性規定（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50條、德國家事及非訟事件程序法第155條第1項），基於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主觀權利性質⁴²，程序當事人亦能在審理過程中直接對法院主張該權利並有拘束法院之效力⁴³。

然而，課予法院憲法（及法律）上的適時審判義務，並不能確保在任何案件中解決紛爭之裁判皆能在適當期間內被作成，毋寧是，對於已（或將）因審判期間之經過而蒙受實體利益（如：因與子女分離時間過長而喪失享有親權之資格）或程序利益損害（如：債務人於過長的審理期間中破產）之當事人而言，法院程序於統計上之迅速性⁴⁴並沒有任何意義⁴⁵，此時，如實際個案之審判期間應被評價為不適當，即構成國家司法給付的瑕疵⁴⁶，並屬（程序）基

38 參見Rüdiger Zuck, Die Gewährleistung effektiven Rechtsschutzes im Zivilprozess, NJW 2013, S. 1132 (1133).

39 BVerfG, NJW 1993, 1635 (unter II.1); Grzeszick (Fn. 10), Art. 20, VII Rn. 139.

40 BVerfG, NJW 1981, 1499 (unter II.2); BVerfG, BeckRS 2013, 56344 (Rn. 31).

41 參見BVerfG, NJW 2001, 214 (unter II.1.b und 2.c): 「鑑於其異常的訴訟期間，即：訴訟卷宗送交邦高等法院時該訴訟已進行約15年之久，縱該案係屬複雜，該院亦不應將之作為一般案件來處置。邦高等法院毋寧應基於自身法律觀點使用所有可能的促進訴訟措施。依情形亦可能要求其採取法院內部的措施以減輕工作負擔」；另參見邱聯恭（註36），頁54-68。

42 Mayer (Fn. 6), Art. 6 Rn. 73.

43 參見前揭註8；亦參見Breuer (Fn. 35), S. 329.

44 沈冠伶（註17），頁88-89指出，我國下級法院審判期間平均而言並不算長。

45 參見Christoph Althammer, Schmerzensgeld wegen überlanger Dauer von Zivilverfahren: Bemerkungen zum künftigen deutschen Entschädigungsmodell, JZ 2011, S. 446.

46 STRICKLER (Y.), Délai raisonnable de jugement, *Juris-Classeur Libertés*, Fasc.

本權之侵害，而產生應如何加以救濟的問題。就此，首先應說明的是：不論以法治國原則或基本權為論證基礎，亦即：或認為國家就違反法治國原則所造成之權利侵害有客觀的排除義務⁴⁷，或認為基本權具有在國家對其為不正當侵害時直接請求不作為、結果排除或回復原狀之內涵⁴⁸，均指向救濟機制存在之必要⁴⁹。不過，當違背公正程序之要求或侵害當事人之程序基本權之行為主體是司法者時，能否鑑於侵害排除的需求，而從法治國原則或程序基本權自身肯定法律明文規定（如：上訴、抗告、再審）以外的程序上救濟途徑，誠有疑問⁵⁰；就此，應重新反省我國大法官否定審級救濟屬於訴訟權保障內容之穩定見解⁵¹的妥當性（下述貳、一）。可是，因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與其他程序基本權之侵害間有所差異，亦即，審判遲延原則上不影響程序之結果或裁判之正確性⁵²，故縱對上開問題（即：是否承認救濟程序基本權侵害之非法定途徑）採肯定見解，而承認諸如不作為抗告等「事前救濟措施」，其有效性亦值懷疑（下述貳、二）。如不能肯認該等措施之有效性，則在涉及民事審判的限度內，法治國原則或基本權自身乃指向國家以金錢為主之（系爭）程序外救濟手段⁵³，就我國目前之法制狀態而言，即

1540, 2007, n° 55.

47 *Schulze-Fielitz* (Fn. 11), Art. 20 Rn. 222.

48 *Fritz Ossenbühl*, *Staatshaftungsrecht*, 5. Aufl., 1998, S. 298 f.; *Grzeszick* (Fn. 10), Art. 20, VII Rn. 153, 155; 李建良，基本權利理論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9卷1期，頁44（1997年）；法治斌、董保城（註2），頁134。

49 蕭文生，基本權利侵害之救濟，收於：李建良、簡資修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二），頁478-479（2000年）。

50 法院之訴訟行為抵觸公正程序之要求時，構成程序瑕疵，原則上應在（民事）訴訟程序上藉由通常救濟途徑予以糾正，參見 *Leipold* (Fn. 7), Vor § 128 Rn. 137 a.E.

51 司法院釋字第574號解釋理由書：「審級制度為訴訟程序之一環，有糾正下級審裁判之功能，乃司法救濟制度之內部監督機制，其應經若干之審級，得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性質及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定之，尚難謂其為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亦參見司法院釋字第512號、第442號、第396號解釋。

52 *Breuer* (Fn. 35), S. 317; *Althammer* (Fn. 45), S.446, 448; *STRICKLER* (Y.), (註46), n° 58.

53 我國學說上立足於基本權之功能或法治國原則，而肯定國家賠償責任之見解，

應優先探討法院審判遲延一事是否及如何構成國家賠償責任⁵⁴；惟此項依我國憲法第24條之委託⁵⁵而一般性規定於國家賠償法的「事後救濟措施」⁵⁶，又因國家賠償法第13條（合憲地⁵⁷）賦予「審判法官特權」（Spruchrichterprivileg）一事，而同樣面臨有效性之疑慮，此時，至少針對程序當事人之適時審判請求權受法院侵害的情形，必須檢討前揭排除國家賠償法之適用之特別規定於憲法上的正當性⁵⁸（下述貳、三）。

承上，如假定我國現行法上對於民事審判遲延的唯一有效救濟

前者如：李建良（註48），頁44；法治斌、董保城（註2），頁134；亦參見Grzeszick (Fn. 10), Art. 20, VII Rn. 153；後者如：許育典（註10），頁70；亦參見Breuer (Fn. 35), S. 167。

54 應附言者係：儘管該等國家（不法）責任之理論基礎，除可能係國家（公務員）賠償責任外，亦得為行政法上準特別犧牲侵害（aufopferungsgleicher Eingriff）補償責任、準徵收侵害（enteignungsgleicher Eingriff）補償責任等法官法（判例法）上之國家責任，參見Heiko Sauer, Staatshaftungsrecht, JuS 2012, S. 695 (698 f.); Heiko Sauer, Staatshaftungsrecht, JuS 2012, S. 800 (801 ff.)，故在我國似亦有捨國家賠償制度，而逕探討民事法院遲延審判應否依上開（憲法）法理加以補償的空間，參見司法院釋字第652號、第670號解釋；陳敏，行政法總論，9版，頁1225-1230、1235-1239（2016年）；然而，著眼於權力分立的憲法原則，本文認為仍應優先檢討制定法上之國家賠償法是否已屬有效之事後救濟手段。

55 葉百修，國家賠償法之理論與實務，4版，頁4（2012年）；司法院釋字第487號解釋。

56 法治斌、董保城（註2），頁175。

57 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理由書：「……各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就同一案件所形成之心證或見解，難免彼此有所不同，倘有心證或見解上之差誤，訴訟制度本身已有糾正機能。關於刑事案件，復有冤獄賠償制度，予以賠償。為維護審判獨立及追訴不受外界干擾，以實現公平正義，上述難於避免之差誤，在合理範圍內，應予容忍。不宜任由當事人逕行指為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而請求國家賠償。唯其如此，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方能無須瞻顧，保持超然立場，使審判及追訴之結果，臻於客觀公正，人民之合法權益，亦賴以確保……」。

58 參見司法院釋字第487號解釋理由書：「立法機關據[憲法第24條]有制定有關國家賠償法律之義務，而此等法律對人民請求各類國家賠償要件之規定，並應符合憲法上之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另要求現行國家賠償法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制度，係國家賠償法所定者⁵⁹，即有必要分析該法第2條第2項之構成要件及其法律效果。申言之：在客觀構成要件上，應否以裁判未於適當期間內作成一事，作為認定受訴法院之審理活動有無「不法侵害人民（當事人）自由或權利」的基準，蓋「適當期間」之判斷已包含法院個別程序作為或不作為的合義務性評價（下述參、一）？在主觀構成要件上，是否以職務義務之違反推認「過失」之存在或要求被告機關就其無過失負舉證責任？又是否應承認組織之歸責事由（Organisationsverschulden）（下述參、二）？在法律效果上，應如何認定權利侵害與所受損害或所失利益間的因果關係、是否及在何限度內可以判給慰撫金（下述參、三）？在國家賠償請求權之行使而言，有無應注意之處（下述參、四）？

上述關於民事法院審判遲延之程序上救濟途徑或程序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受侵害之國家賠償責任，在我國民事程序法學界難謂已為充分之研討⁶⁰。此一問題所牽涉的基本爭議，即：司法不法的國家責任，在我國亦僅存相當有限之研究及裁判⁶¹。相對於此，儘管在「民事事件」之範疇內（即：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所稱之「因其權利義務涉訟」⁶²），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對於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所保障適時審判之內涵⁶³及締約國應如何依同公約第2條

59 相對於此，我國就刑事審判之遲延則設有特別救濟途徑（我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參見何賴傑，訴訟迅速原則之具體實踐——以德國刑事訴訟晚近發展為例，月旦法學雜誌，229期，頁55-59（2014年）。

60 惟參見沈冠伶（註16），頁49-52；沈冠伶（註17），頁88-97；吳從周，民事法官懈怠案件之進行與當事人之權利救濟——從德國「不作為抗告法」（Untätigkeitsbeschwerdengesetz）之制定思考我國法之出路，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00期，頁34以下（2007年）。

61 明確指出此項缺陷者：范文清，論法官與檢察官的國家賠償責任，台灣法學雜誌，221期，頁28-29（2013年）。

62 關於公政公約第14條之「事物之適用範圍」，參見HENNEBEL (L.), *La jurisprudence du Comité des droits de l'homme des Nations Unies: Pacte international relatif aux droits civils et politiques et son mécanisme de protection individuelle*, 2007, Bruxelles, Bruylant, n° 229 s.

63 同前揭註32。

第3項負「有效救濟」(effective remedy)義務等事⁶⁴，尚乏可觀之「解釋」(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含：一般性意見、個人申訴意見)⁶⁵，而未必能直接提供我國法解釋之具體指標；不過，由於公政公約與歐洲人權公約在人權保障標準上具有本質類同性⁶⁶，亦得藉由歐洲人權法院在「民事事件」範疇內(即：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所稱之「民事權利或義務之爭訟」⁶⁷)就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第13條所作為數眾多之裁判，一方面間接探知公政公約之「立法意旨」(兩公約施行法第3條)，另一方面則充實對於我國憲法第16條進行「比較法解釋」之基礎(上述壹、一)。並且，以歐洲人權法院於2000年之*Kudla*案中之下述判示為首，即：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就遲延審判所造成同公約第6條第1項之侵害，要求各締約國提供規範上及實踐上之「有效救濟」管道(含：事前的預防或事後的回復機制)⁶⁸，歐洲人權法院對於各締約國所提供之法律制度是

64 如：Czernin v. Czech Republic, Communication No. 823/1998, U.N. Doc. A/60/40, Vol. II (3 October 2005), <http://hrlibrary.umn.edu/undocs/823-1998.html>。在本案，兩公約人權委員會僅簡單指出行政機關遲未依法院裁判為異議人辦理國籍登記一事，構成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並要求國家應履行其救濟義務；關於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與第2條第3項之關係，參見UN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RC), *supra* note 32, para. 58.

65 兩公約人權委員會基於個人申訴而就公政公約第14條所為之「意見」(參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議定書》)，主要係針對刑事追訴(<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CPR/Pages/Jurisprudence.aspx>)；此實與兩公約人權委員會就同條之「事物之適用範圍」的限縮見解有關，參見IDOUX (P), MILANO (L.), (註4), n° 14 *in fine*；關於「解釋」公約之依據，參見HENNEBEL (L.), (註62), n° 36.

66 請參見GUINCHARD (S.) et al., *Droit processuel. Droit fondamentaux du procès*, 7^e éd., Paris, Dalloz, 2013, n° 59; IDOUX (P), MILANO (L.), (註4), n° 16；亦參見Eckart Klein著，王士帆譯，「歐洲人權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際人權保障的基柱，月旦法學雜誌，238期，頁280-281(2015年)。

67 關於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之「事物之適用範圍」，參見Frank Meyer, in: Karpenstein/Mayer (Hrs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EMRK*, 2. Aufl., 2015, Art. 6 Rn. 13 ff.

68 *Kudla v. Poland*, App. No. 30210/96, 35 Eur. H.R. Rep. 198 (2000); 本案之中文介紹：吳從周(註60)，頁37-40。

否足以實現同公約第13條課予之義務（同公約第1條）進行具體審查，而在此背景下，德國法上近來對於遲延審判之國家賠償責任（德國基本法第34條、德國民法第839條）所呈現之態度轉變⁶⁹、國家責任法上特殊類型之請求權（*staatshaftungsrechtlicher Anspruch sui generis*）於2011年之立法（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以下）⁷⁰、法國法上晚近就其1978年法院組織法第L. 781-1條（現：同法第L. 141-1條）所定司法機關責任之擴張解釋⁷¹等發展，甚值關注。受啟發於該等外國法之規範狀態，以下即在歐洲人權公約、德國、法國法與我國法制狀態不盡相同的認知上，探討我國（國家賠償）法如何透過「解釋論」（*de lege lata*）發揮救濟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的功能。

貳、法院遲延審判的救濟必要性及其手段

一、訴訟權就法院侵害程序基本權之防衛機能

受憲法保障的接近使用法院權或法治國原則，要求國家必須提供司法制度以保護當事人之權利或解決紛爭，已如上述（壹、

69 簡要的說明：*Christine Steinbeiß-Winkelmann*, *Amtshaftungsansprüche wegen überlanger Verfahrensdauer*, NJW 2014, S. 1276 (1276 ff.).

70 必須指出的是：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所定之請求權，係在不要求法院之「可歸責性」的前提下，以彌補當事人因國家「不法」之高權行為所生的不利益為旨，因此，該規定所使用之「補償」（*Entschädigung*）概念係與其他國家責任法上所理解者並不相同，*Regierungsentwurf [Cabinet Draft]*, DEUTSCHER BUNDESTAG: DRUCKSACHEN [BT] 17/3802, S. 19 (Ger.)；批判見解：*Harald Reiter*, *Die Rechtsnatur des Entschädigungsanspruchs wegen unangemessener Verfahrensdauer*, NJW 2015, S. 2554 (2555 ff.).

71 參見SABOURAULT (D.), *La fonction juridictionnelle entre autorité, indépendance et responsabilité*, in DEGUERGUE (M.), *Justice et responsabilité de l'État*, Paris, PUF, pp. 185-193；中文的精要整理：王必芳，概述法國法上的「審判法官特權」，台灣法學雜誌，221期，頁56-57（2013年）。

一)。惟至少就民事程序而言，此一基本權或憲法原則並未以法院之裁判得受上級法院審查（有無違背實體或程序法規範）為要素⁷²，亦即：憲法僅確保一次性的訴訟制度使用權，而不要求審級制度之存在⁷³，蓋以：審級救濟固然對於良善的司法運作有明顯之助益⁷⁴，但為維護法安定性及追求法之和平、避免紛爭無止盡地延續，欠缺上級審所產生錯誤法律適用之風險仍屬憲法所容許者⁷⁵；此事並與合理分配國家資源的現實考量相一致⁷⁶。此不僅係我國釋憲實務的穩定見解⁷⁷，在比較法之觀察上亦見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⁷⁸或法國憲法委員會⁷⁹之裁判，且不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⁸⁰。就此，儘管學說上或著眼於法院之裁判亦屬可能對人民權利造成侵害之高權行為⁸¹，或著眼於作為訴訟權一環之防禦權（*droits de la défense*）所具有挑戰司法裁判之面向⁸²，而對於前述見解採取批判的態度⁸³，由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及家事事件法）已就判決最

72 關於刑事有罪判決的不同規範狀態：歐洲人權公約第7議定書第2條。

73 參見許志雄等合著（註2），頁231。

74 FRICERO (N.), (註5), n° 211.51.

75 BVerfG, NJW 2003, 1924 (unter I.2.b); *Andreas Voßkuhle*, Bruch mit einem Dogma: Die Verfassung garantiert Rechtsschutz gegen den Richter, NJW 2003, S. 2193 (2193 f.).

76 FRICERO (N.), (註5), n° 211.51.

77 參見前揭註51。

78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貫見解：BVerfG, NJW 2004, 1371 (unter II.1.a.aa m.w.N.).

79 Conseil constitutionnel [CC] [Constitutional Court] decision No.2004-491DC (consid. 4), Feb. 12, 2004.

80 *Chatellier c. France*, No. 34658/07,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May 3, 201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04283>.

81 *Andreas Voßkuhle*, Erosionserscheinungen des zivilprozessualen Rechtsmittelsystems, NJW 1995, S. 1377 (1383); *Voßkuhle* (Fn. 75), S. 2196.

82 BOLARD (G.), *Les principes directeurs du procès civil : Le droit positif depuis Henri Motulsky*, JCP, 1993, éd. G, I, 3693, n° 16; GUINCHARD (S.), CHAINAIS (C.), FERRAND (F.), *Procédure civile: Droit interne et européen du procès civil*, 31^e éd., Paris, Dalloz, 2012, n° 735.

83 FRICERO (N.), (註5), n° 211.51認為特別在以下情形，不應剝奪審級救濟之機會，即：法官逾越權限、拒絕審判、明顯牴觸實體或程序基本原則或適用法律顯有錯誤等情形；惟*Breuer* (Fn. 35), S. 54 f.認為，憲法就裁判所造成法律位階

少設有兩個審級，且肯定再審制度，故無須加以質疑⁸⁴；憲法毋寧僅禁止法院過苛地解釋適用審級制度之合法要件⁸⁵，因為公正程序之要求亦指向法定審級救濟的合理使用⁸⁶。

然而，在當事人之基本權遭受法院審判行為侵害的情形，特別係制定法上並不存在救濟機會時（如：上訴利益未逾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66條所定數額），憲法是否仍不要求一個審查該裁判的程序機制，不能無疑。就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2003年下述聯合庭裁定（Plenarbeschluss），修正同院向來基於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4項所定「公權力」之限縮解釋，否定當事人有就法院裁判請求司法救濟之權的見解⁸⁷，肯定以法治國原則（德國基本法第20條第3項）及一般人格權（同法第2條第1項）為根據之「一般司法給付請求權」（allgemeiner Justizgewährungsanspruch）⁸⁸於法院侵害「程序基本權」時，亦有其適用，否則人民對於只可能受法院侵害的程序基本權，將欠缺透過專業法院（德國基本法第95條第1項參照）加以矯治的機會⁸⁹，深具啟發性：

在該案中，憲法訴願人於邦高等法院之原訴訟程序上受有「聽審請求權」（德國基本法第103條第1項）之侵害，惟該院並不許可上訴，憲法訴願人向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之非常救濟亦遭駁回。就此，受理系爭憲法訴願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庭認為，該邦高等

的（程序或實體）權利侵害，並不要求給予救濟機會。

84 沈冠伶（註16），頁38。

85 參見吳庚（註2），頁131；Uhle (Fn. 1), § 129 Rn. 31 a.E.

86 Meyer-Ladewig (Fn. 20), Art. 6 Rn. 61.

87 參見Schmidt-Aßmann (Fn. 9), Art. 19 Abs. 4 Rn. 96.

88 依照聯邦憲法法院一貫的定義，所謂「一般司法給付請求權」係指：接近使用法院、就訟爭標的受事實及法律上的完整審查及獲得終局裁判之權利，參見BVerfG, NJW 1992, 1673 (unter I)；此項定義，略同於歐洲人權法院就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所保障之「接近使用法院權」所為者，參見Meyer-Ladewig (Fn. 20), Art. 6 Rn. 32 ff.

89 BVerfG, NJW 2003, 1924 (unter I.3.b.bb.(2)).

法院及聯邦最高法院的見解有害於當事人之司法給付請求權，而應給予救濟機會，然此事將與同憲法法院第二庭先前表示之見解相牴觸，經第一庭徵詢第二庭並獲悉後者無意變更見解後，即依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第16條第1項召開聯合庭裁判之。在聯合庭所作成之裁定中，聯邦憲法法院首先確立以下解釋原則，即：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4項並不妨礙以一般司法給付請求權給予當事人更廣泛之權利保護⁹⁰。其次，該院強調合法聽審係裁判終局（確定）性的正當基礎，蓋聽審請求權與接近使用法院權間具功能關連性，如當事人於程序上未受聽審，則其被肯定之使用法院權利亦會遭空洞化，而既不能在主觀上合理要求當事人接受該裁判，亦在客觀上減損法治國家之司法機能。因此，一般司法給付請求權亦保障聽審請求權受侵害時之救濟機會，縱該基本權侵害首次發生於上級審者，亦同，因為聽審請求權並不僅單純保障當事人之陳述機會，而係以徹底之突襲禁止（Überraschungsverbot）為意旨，故基於實效權利保護的法治國原則，縱聽審請求權之侵害係見於終審法院，亦必須存在一個程序上的救濟途徑，惟就該救濟法院之裁判，則為追求法安定性，不必再設立審查制度⁹¹。就此，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以承認立法者之形成自由為前提，認為該救濟制度未必應以審級保障為之，同法院（*iudex a quo*）的自我審查亦得符合前揭要求⁹²。最後，該院指出當時德國民事訴訟法並未提供一個合於救濟法明確性（*Rechtsmittelklarheit*）的機制，故除仍容許以聽審權受侵害為理由提起憲法訴願外，另課予立法者創設該等救濟制度之義務，並預慮立法怠惰之情形，賦予主張未受合法聽審之人於原法院聲請續行程序之權利⁹³。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上開裁判雖僅以「聽審請求權」之

90 BVerfG, NJW 2003, 1924 (unter I.3.b.cc).

91 BVerfG, NJW 2003, 1924 (unter II.1 ff.).

92 BVerfG, NJW 2003, 1924 (unter III.1.a).

93 BVerfG, NJW 2003, 1924 (unter IV.2 f.); 因此，德國民事訴訟法第321a條於2005年修正，擴張聽審異議（*Anhörungsgrüge*）之適用對象及於所有不得撤銷之裁判，參見 *Jürgen Treber*, Neuerungen durch das Anhörungsrügensgesetz, NJW 2005, S.

侵害為標的，惟該院應無將其他程序基本權受法院初次侵害的情形，排除於前述一般司法給付請求權適用範圍外之意思⁹⁴，德國學說毋寧多肯定司法給付請求權具有一般性要求救濟「程序基本權」之侵害的內涵⁹⁵，且認為此事亦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所定「有效救濟」公約第6條第1項之程序基本權侵害的意義⁹⁶。

上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論理，如不論其特殊之釋義學脈絡（即：德國基本法第19條第4項與一般司法給付請求權間之關係），亦值援用於我國法。換言之：如法院指揮、運作程序欠缺公正性，而侵害我國憲法第16條保障當事人之「訴訟權」，憲法即要求一個在系爭程序上排除該項侵害之救濟機會⁹⁷，否則，相對於「實體基本權」受侵害時，人民被確保有使用司法制度之權利的情形，當事人不能對於遭受法院初次侵害之「程序基本權」⁹⁸主張接近使用法院權一事，即構成保護漏洞⁹⁹。在此意義上，諸如司法院釋字574號解釋（理由）所指審級救濟非屬訴訟權保障內容等旨，應予限縮¹⁰⁰。因此，認為審判行為對訴訟權之侵害或得構成許可上訴第三審之事由（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或得類推適用異議制度（同法第484條第1項但書）、或應該當（準）再審之要件（同法第

97 (97 ff.).

94 參見BVerfG, NJW 2004, 1371 (unter II.1.a.aa).

95 *Vöβkuhle* (Fn. 75), S. 2197; *Vöβkuhle/Kaiser* (Fn. 5), S. 313; *Uhle* (Fn. 1), § 129 Rn. 13, 26; *Breuer* (Fn. 35), S. 41, 78 ff.; *Volker Lipp*, Rechtsschutz gegen den Richter, in: Münch (Hrsg.), Prozessrecht und materielles Recht, 2015, S. 201 (204 m.w.N.); 惟關於「實體基本權」之侵害，參見*Breuer* (Fn. 35), S. 80；蕭文生（註49），頁485。

96 參見*Breuer* (Fn. 35), S. 41 f.; *Lipp* (Fn. 95), S. 201, 202.

97 參見許育典（註10），頁306-307；法治斌、董保城（註2），頁284；蕭文生（註49），頁483。

98 關於法院適用違反訴訟權保障之法律而侵害程序基本權的「立法不法」（非「司法不法」）問題，參見*Breuer* (Fn. 35), S. 76.

99 *Uhle* (Fn. 1), § 129 Rn. 13; 亦參見*Konrad Redeker*, Verfahrensgrundrechte und Justizgewährungsanspruch, NJW 2003, S. 2956 (2957).

100 類似見解：許宗力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574號解釋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第一點。

496條第1項、第497條、第507條)，而使他法院矯正程序基本權之侵害並重為公正審判之見解¹⁰¹，實屬合憲性解釋（*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之必然歸結¹⁰²。除此之外，我國（法院）為履行公政公約第2條第3項所課予國家「有效救濟」公約第14條第1項之程序基本權侵害的義務，亦應採行上述解釋論¹⁰³。

二、法院遲延審判的程序上救濟可能

如上（貳、一）所述，訴訟權（接近使用法院權）之保障亦及於訴訟權遭受法院侵害的情形，亦即：當事人對於不公正之審判有請求排除此一侵害結果的救濟權。然而，相對於其他與裁判內容之正確性具密切關連的程序基本權（如：聽審請求權）¹⁰⁴，「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並不可能透過上訴或再審制度，以廢棄原判決並重新進行一個迅速審判程序的方式加以回復¹⁰⁵。符合憲法（及公政公約）要求之救濟途徑毋寧只可能是以下兩種，即：（1）於程序進行中藉由促進程序之措施以謀求審判期間的適當性，以及（2）於程序終結後對於審判遲延所生之不利益進行彌補（*Kompensation*）¹⁰⁶。在此意義上，歐洲人權法院於前揭（壹、二）*Kudla*案中，就審判遲延之「有效救濟」機制（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明確表示其或應以事前預防侵害的發生或繼續，或以事後適當復原（*adequate*

101 沈冠伶（註16），頁41-49。

102 參見Lipp (Fn. 95), S. 206 f.

103 關於公政公約第2條第3項所謂「有效救濟」之內涵，參見HENNEBEL (L.)，（註62），n° 48 ss；關於本條與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之同質性，參見Schilling (Fn. 28), Rn. 476 ff.

104 參見Breuer (Fn. 35), S. 81.

105 參見沈冠伶（註16），頁49；邱聯恭（註36），頁78；其實，訴訟法上本難有透過上訴或再審制度救濟適時審判請求權侵害的空間，因為上訴或再審有理由的前提之一係「系爭瑕疵與裁判結果間之因果關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477條之1、第504條），而審判遲延一事基本上不該當之，參見Breuer (Fn. 35), S. 349; Althammer (Fn. 45), S. 448.

106 Christoph Brüning, Staatshaftung bei überlanger Dauer von Gerichtsverfahren, NJW 2007, S. 1094 (1095).

redress、angemessene Wiedergutmachung) 已發生的侵害之方式為之¹⁰⁷；其中，歐洲人權法院曾數次指出前者實係最佳方案，因為事前預防方案可以避免需認定原程序有無後續侵害一事所造成之不便，且非如事後復原方案般僅能於事後修補該侵害¹⁰⁸。依此，賦予當事人於受訴法院未適時為程序作為（如：指定言詞辯論期日、作成判決等）時，向上級法院聲請定期命從事系爭行為之權的制度（如：奧地利法院組織法第91條），被認為符合同公約第13條之有效性要求¹⁰⁹；至於法官法上對於未迅速執行職務所設的職務監督制度（如：德國法官法第26條第2項、我國法官法第19條第1項、第21條），則不屬之，蓋當事人並無請求監督權人採取監督措施之主觀權利¹¹⁰。

為預防或排除審判遲延之狀態，以確保或救濟當事人之適時審判請求權，德國學說及下級審實務見解過去多肯定一個法無明文之「不作為抗告」（*außerordentliche Untätigkeitsbeschwerde*）的合法性¹¹¹，亦即：鑑於歐洲人權公約以及德國基本法之適時審判要求，

107 Kudła v. Poland, App. No. 30210/96, 35 Eur. H.R. Rep. 198 (2000); 同：Mifsud v. France, App. No. 57220/00, 2002-VIII Eur. Ct. H.R. (2002)；亦參見 *Meyer-Ladewig* (Fn. 20), Art. 13 Rn. 11.

108 Scordino v. Italy, App. No. 36813/97,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2925>; Sürmeli v. Deutschland, App. No. 75529/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5689>; *Marten Breuer*, in: Karpenstein/Mayer (Hrs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EMRK*, 2. Aufl., 2015, Art. 13 Rn. 59. 另指出，事後（透過金錢）復原方案僅有間接促進訴訟之功能，且可能對國家財政造成過大負擔。

109 Holzinger v. Austria, App. No. 23459/94,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59165>；然而，關於奧地利法院組織法第91條所謂「定期限之聲請」（*Fristsetzungsantrag*）制度，應注意者係：上級法院如依當事人之聲請定期命受訴法院為一定之程序行為，而後者仍逾期不為者，該制度本身並未提供任何制裁手段，僅得依懲戒程序或國家賠償責任處理，*Norbert A. Schoibl*, in: *Fasching/Konecny* (Hrsg.), *ZPO*, Bd. 4/1, 2. Aufl., 2005, Vor § 461 Anh. Rn. 10, 46.

110 Sürmeli v. Deutschland, App. No. 75529/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5689>; *Althammer* (Fn. 45), S. 447.

111 *Brehm* (Fn. 8), Einl. Rn. 292; *Leipold* (Fn. 7), Vor § 128 Rn. 131; 詳見吳從周（註60），頁42-45的整理。

在法院之行為實際上造成全然拒絕裁判或等同於停止訴訟、因法院異常的遲延或完全不作為而構成恣意拒絕權利保護等情形，得容許當事人提起此項特殊救濟¹¹²，並且，於前揭不作為無正當理由（如：事案的複雜性、可歸因於程序當事人之行為）時，無論受理系爭案件之法官有無可歸責性，該不作為抗告應為有理由¹¹³。不過，此種透過法官造法被肯定之預防或排除審判遲延的途徑，由於在要件或效果上皆不具體，既不被歐洲人權法院認可其有效性（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¹¹⁴，亦遭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否定其救濟法明確性¹¹⁵。在德國2005年之「法院不作為抗告法草案」未完成立法，而至遲於2011年底「關於過長之法院程序及刑事偵查程序之權利保護法」生效後¹¹⁶，因為立法者表明不採抗告形式之救濟方式，而係採行同法院程序上之遲延異議（Verzögerungsrüge）與事後金錢補償的規範模式（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已終局地否定前開不作為抗告之許可性（Statthaftigkeit）¹¹⁷。

在我國，一方面不存在前述德國的立法背景，另一方面憲法（及公政公約）亦指向一個預防或及時排除審判遲延的救濟機制，故仍有探討我國民事訴訟法解釋論上是否容許「不作為抗告」之價值。就此，學說上有參考德國舊學說、實務見解者，認為在法院經相當時期懈怠不進行案件的情形，應類推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87條，准許當事人提起不作為抗告者¹¹⁸。此項見解雖特別在下述情形

112 參見OLG Frankfurt, BeckRS 2011, 16993 (unter II.1).

113 OLG Düsseldorf, NJW 2009, 2388 (2388 f.), 本案受訴法院就給付承攬報酬訴訟逾1年未為任何促進訴訟措施（如：指定言詞辯論期日），被抗告法院認為實質上陷於訴訟停止。

114 Sürmeli v. Deutschland, App. No. 75529/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5689>.

115 BVerfG, NJW 2008, 503 (unter 1).

116 關於前一草案之詳細介紹：吳從周（註60），頁46-50；關於新法之簡介：沈冠伶（註17），頁91-95。

117 BGH, NJW 2013, 385 (Rn. 4).

118 吳從周（註60），頁53-54。

可資贊同，即：審判期間的經過將導致系爭實體基本權的減損或喪失，而無從在事後充分地予以復原者；典型的案例係父母就子女住所之爭議、定面會交往權之程序以及請求交付子女之家事紛爭（我國家事事件法第3條第5項參照）¹¹⁹，蓋在該等程序中，國家除有義務儘快作成裁判外¹²⁰，更應防免當事人受憲法保障之「家庭生活權」¹²¹因審理期間之經過所可能遭受不可回復之損害，而必須給予程序關係人促使程序迅速進行之有效手段¹²²。然而，無論涉及何種民事紛爭類型，均不能忽略的是：不作為抗告本身亦容易進一步造成程序之拖延，而有遭濫用的風險¹²³，且其無力克服審判遲延係出於法院案件負擔過重之組織性因素¹²⁴、法院於個案中未行集中審理

119 *Georg Rixe*, Effektiver Rechtsschutz gegen überlange Gerichtsverfahren – Zugleich eine Kritik des Regierungsentwurfs, FamRZ 2010, S. 1965 (1968).

120 兩公約人權委員會亦基於子女監護或面會交往事件之本質，明確強調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要求一個非常迅速的程序，*Fei v. Colombia*, Communication No. 514/1992, U.N. Doc. CCPR/C/53/D/514/1992 (1995), <http://hrlibrary.umn.edu/undocs/html/vws514.htm>.

121 參見羅昌發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696號解釋所提出之協同意見書第貳點；惟我國釋憲實務並未明白肯定「家庭權」之基本權地位（參見公政公約第17條第1項、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第1項），而僅表示「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參見司法院釋字第712號解釋理由書。

122 *Bergmann c. République tchèque*, No. 8857/08,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Oct. 27, 201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07170>; 明確的判示：*Kuppinger v. Deutschland*, App. No. 62198/1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50299>；在此限度內，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所定「遲延異議」實不具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所要求之有效性，參見*Breuer* (Fn. 108), Art. 13 Rn. 57, 因此，德國家事及非訟事件程序法於2016年底增訂第155b條，明文賦予親子關係事件之關係人「促進程序異議」（Beschleunigungsrüge）之權；至於在我國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35條之1並未準用民事訴訟法第187條，且家事事件法第79條、第43條未明文承認關係人對於法院停止程序裁定之抗告權（參見德國家事及非訟事件程序法第21條第2項）的規範狀態下，如何就親子非訟事件程序尋得「不作為抗告」之法律基礎，則屬有待研究之問題。

123 參見*Steffen Roller*, Möglichkeiten des Gesetzgebers zu einer Beschleunigung gerichtlicher Verfahren, ZRP 2008, S. 122 (122 f.); 不同見解：*Rixe* (Fn. 119), S. 1967 f.

124 *Breuer* (Fn. 35), S. 354.

以致進行數次無結果之期日或調查不必要證據的情形¹²⁵，又甚至（於上級法院得命受訴法院採取特定程序行為時）會引發侵犯法官獨立性之疑慮¹²⁶，此外，不作為抗告在要件及效果上的不明確性，亦不可避免地降低其作為防止審判遲延措施之有效性¹²⁷。因此，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及家事事件法）就「不作為抗告」欠缺具體規定的現況下，其理論上的運用可能性尚不能被視為事前預防適時審判請求權侵害之有效手段，一個事後復原機制的存在仍屬必要¹²⁸。

三、法院遲延審判的國家賠償責任與審判法官特權

對於法院審理活動違反適時審判之法治國要求，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及家事事件法）上並無有效的程序上救濟管道一事，已如上述（貳、二）。此時，基於法治國原則之要求（及公政公約第2條第3項之義務），必須給予因審判遲延而蒙受不利益之當事人事後的（金錢）彌補，在我國現行法制狀態下，即產生如何解釋適用國家賠償制度之課題¹²⁹。事實上，此一結論亦符合歐洲人權法院的以下論述，即：一個妥適回復已發生之遲延的事後補救措施（如：法國舊法院組織法第L. 781-1條），並不因其不能加速繫屬中程序之進行，而被否定作為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有效救濟權利侵害制度之地

125 沈冠伶（註17），頁96。

126 參見Breuer (Fn. 108), Art. 13 Rn. 56.

127 依照Breuer (Fn. 35), S. 354 f. 的整理，在德國實務上不作為抗告有理由時的法律效果，大多僅命下級法院速為審判，甚少限定其審判期間。

128 在此限度內，不生「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參見翁岳生，西德一九八一年國家賠償法之研究——中德國家賠償制度之比較與檢討，收於：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頁132（2008年））之問題；關於我國學說、實務上就該原則之質疑，參見程明修，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法學叢刊，52卷4期，頁41-42（2007年）；董保城、湛中樂，國家責任法——兼論大陸地區行政補償與行政賠償，頁183-184（2005年）；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595號民事判決。

129 參見Hans-Jürgen Papier,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I, Stand: 70. EL 2013, Art. 34 Rn. 88；參見前揭註54。

位¹³⁰，換言之，預防性或彌補性的權利保護途徑係屬等價¹³¹。因此，法國下級法院自20世紀末期以來認定未適時審判即該當法國（舊）法院組織法第L. 781-1條所稱之「拒絕審判」（*déni de justice*），而成立國家賠償責任的穩定見解¹³²，使此一內國規範合於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之要求¹³³。至於德國民法第839條、德國基本法第34條所定之國家賠償規範，理論上雖無疑得作為事後救濟審判遲延之途徑¹³⁴，惟礙於實務上的保守態度，且欠缺賠償非財產損害之可能性，而難被肯認為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所要求之有效救濟制度¹³⁵，但2011年底生效之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以下規定，則在「適當時期」與「妥適補償」的判斷上以歐洲人權法院之判例法為指標，並不以法院主觀上之「可歸責性」為要件，不再生違反同公約的問題¹³⁶。

（一）審判法官特權之正當基礎

然而，如欲論證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作為審判遲延之事後救濟手段的有效性，則除個別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的具體化需求

130 *Mifsud v. France*, App. No. 57220/00, 2002-VIII Eur. Ct. H.R. (2002).

131 *Althammer* (Fn. 45), S. 447.

132 如：*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TGI] [ordinary court of original jurisdiction] Tarascon*, Jun. 20, 2003, D. 2003 inf. rap. 2732 (Fr.), *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 [TGI] [ordinary court of original jurisdiction] Nice*, Nov. 17, 2001, JurisData n° 2001-186027 (Fr.).

133 *Giummarra et autres c. France.*, No. 61166/00,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Jun. 12, 2001), <http://hudoc.echr.coe.int/webservices/content/pdf/001-32472?TID=thkbhnlzk>.

134 參見BGH, NJW 1998, 2288 (2289); *Breuer* (Fn. 35), S. 328 ff.; *Brehm* (Fn. 8), Einl. Rn. 292.

135 *Sürmeli v. Deutschland*, App. No. 75529/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5689>. 在本案，儘管德國政府舉出2005年慕尼黑邦法院一則以行政法院審判逾時為由命國家賠償之（確定）判決（LG München I, BeckRS 2011, 11982），仍未能說服歐洲人權法院德國現行國家賠償制度作為「實際上」有效救濟途徑之資格，蓋其僅屬初審法院之見解而已。

136 *Taron v. Deutschland*, No. 53126/07, Europäischer Gerichtshof für Menschenrechte [EGMR], NVwZ 2013, 47 (May 29, 2012).

外，最大的障礙在於同法第13條所定之「審判法官特權」，亦即：法院審理案件縱侵害程序當事人之適時審判請求權、違反憲法（及公政公約）所課予之適時審判義務，依照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規定，只要此事非出於「犯職務上之罪並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即不適用國家賠償法。但是，因為此一規定限縮了法治國原則或基本權效力所具備的國家責任內涵，必須接受合憲性的檢驗（上述壹、二），換言之：法官執行審判職務侵害人民權利之免責規範，應有憲法上的正當性¹³⁷。

承此，正當化審判法官特權的可能理由之一，係憲法上「審判獨立」之要求（我國憲法第80條），申言之：依照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理由所指，如不設此免責制度，審判法官將因其就法律或事實的心證或見解上差誤被追究責任，而無法達成「執行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方能無須瞻顧，保持超然立場，使審判及追訴之結果，臻於客觀公正，人民之合法權益，亦賴以確保」之目的。此項論旨，實同於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向來以確保法官獨立性作為德國民法第839條第2項（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參照）¹³⁸之重要法理基礎的見解，蓋對於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而言，法官獨立性之意義在於「法官毋須擔心其行為被以作為賠償請求原因的方式加以責難，並

137 就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未區別法官與檢察官，認為因違反體系正義原則而違憲者：李惠宗，「體系正義」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探討——以釋字第二二八號解釋為素材，憲政時代，16卷2期，頁26（1990年）；贊同見解：董保城、湛中樂（註128），頁151；認為該條之立法逾越我國憲法第24條所承認之立法裁量界限，導致公務員個人責任加重、空洞化國家賠償制度之目的、未能平等對待刑事、民事或行政法院法官，從而難謂合憲者：蔡志方，從立法裁量權之界限，論國家賠償法第十三條之合憲性，收於：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二），頁297-298（1993年）；劉鐵錚大法官於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所提出之不同意見書。前揭文獻雖論及系爭國家賠償規定的合憲性，惟並非針對「審判法官特權」本身的憲法上正當基礎立論，與本文所關心者尚有不同。

138 關於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與德國民法第839條第2項在要件上的不同，參見翁岳生（註128），頁116-117。

在此限度內受到其他法官的重新審查」¹³⁹。儘管以審判獨立之要求證成審判法官特權之取徑，引發學說上的大力批判¹⁴⁰，但法官自己可能就其審判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一事，實難謂不會觸及審判獨立原則¹⁴¹。不過，審判獨立之要求固然能相當程度正當化審判法官個人的責任免除，卻不能合理說明國家司法不法責任的限制¹⁴²，蓋就當事人之損害負擔賠償責任者係國家，只要就求償權的發動為適當的設計（如：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3項），個別法官所面臨者充其量僅係自己之裁判行為受他法院指為不法的不適感，與可能因此間接喪失的升遷機會而已¹⁴³，而既然前一問題亦見於審級制度的運作、後一問題則應在職務監督的合憲設計中加以解決（如：我國法官法第19條、第21條、第73條）¹⁴⁴，故法官審判不受干涉的保障並不因此處所述之國家責任受到減損¹⁴⁵。

139 指標判決：BGH, NJW 1968, 989 (unter III.2)；詳細的中文翻譯：范文清（註61），頁32。

140 參見 *Hans-Jürgen Papier*, in: Habersack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d. V, 6. Aufl., 2013, § 839 Rn. 322; *Heinz Wöstmann*, in: Staudinger (Hrsg.),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d. II, Neubearbeitung 2012, § 839 Rn. 314; 葉百修（註55），頁117；亦參見范文清（註61），頁33-36。

141 *Breuer* (Fn. 35), S. 179; 亦參見德國民法第839條第2項強調維護法官獨立之立法理由，Motive zu dem Entwurf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es für das Deutsche Reich, Bd. II, 1888, S. 824.

142 參見EuGH, NJW 2003, 3539 (Rn. 42)；本案之中文簡介，參見Thomas Groß著，林明鏘譯，歐洲共同體法對德國國家責任法之影響，月旦法學雜誌，188期，頁75-76（2011年）。

143 *Breuer* (Fn. 35), S. 181 f.

144 關於職務監督制度所具限制審判獨立要求之射程範圍的意義，參見 *Christian Hillgruber*,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X, Stand: 70. EL 2013, Art. 97 Rn. 79; *Hans-Jürgen Papier*, Die richterliche Unabhängigkeit und ihre Schranken, NJW 2001, S. 1089 (1091)；在我國，強調應平衡兼顧職務監督所擔保之司法公正性與法官獨立審判之憲政價值，而詳細分析我國法官法並對同法第19條、第20條、第21條及第47條等規定為修法建議者：林明鏘，職務監督與審判獨立，法學叢刊，240期，頁3以下（2015年）。

145 在法國，（職業）法官獨立性之保障雖然在過去被用以正當化控訴法官程序（法國舊民事訴訟法第505條以下）的設立以及國家司法機關就其瑕疵運作責任的嚴格要件（法國法院組織法第L. 141-1條第2項：重大過錯及拒絕審判），

相對於此，法治國原則所要求之「法安定性」則得構成限制國家司法不法責任的正當根據；在此意義上，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之結論尚值贊同。就此，必須強調的是，所謂的法安定性並不同於法律意義的裁判實質確定力（既判力），因為裁判所具有的一事不再理（*ne bis in idem*）或拘束效力僅能在前後程序具當事人具同一性之條件下發生，而作為國家賠償責任訴訟之被告的國家，多非前程序之當事人，不能認為受前裁判的既判力所及¹⁴⁶，更何況，容認司法不法之國家責任的裁判，並不必然需要廢棄作為權利侵害原因之原裁判¹⁴⁷。透過審判法官特權所欲追求之法安定性，毋寧係廣義地指向紛爭解決的終局性需求，亦即：不允許藉由嗣後的責任訴訟，任意地就一個已被終局認定的法律關係再啟爭執¹⁴⁸；在此限度內，與其稱之為「審判法官之特權」，更宜採用「法官裁判之特

參見CADIET (L.), JEULAND (E.), *Droit judiciaire privé*, Paris, LexisNexis, 8^e éd., 2013, n° 72, 惟特別自法國最高法院聯合庭於2001年*Bolle*案之裁判中為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保障接近使用法院權之要求而客觀化重大過錯之定義以來（Cour de cassation [Cass.] [supreme court for judicial matters] ass. plén., Feb. 23, 2001, n° 99-16165：「構成重大過錯者係具下述特徵之所有缺失，即：一事實或一系列的事實傳達出司法機關無力履行其被賦予之任務」），相對於司法制度使用者的權利保護，法官獨立在司法不法責任的限制論上顯然已不再佔據決定性地位，參見SABOURAULT (D.), (註71), p. 202; DEBBASCH (C.), *Le nouveau régime de responsabilité de la justice*, *Recueil Dalloz*, 2001, 1752 sous I; MÈNURET (J.-J.), *Compatibilité du régime spécial de responsabilité de la puissance publique de l'article L. 781-1 du Code de l'organisation judiciaire avec l'article 6 de la Convention EDH et redéfinition de la notion de faute lourde*, *JCP*, 2001, II, 10583, n° 7.

146 *Breuer* (Fn. 35), S. 187 f.; 范文清 (註61), 頁37。

147 EuGH, NJW 2003, 3539 (Rn. 39).

148 德國通說：*Ossenbühl* (Fn. 48), S. 101 f.; *Wöstmann* (Fn. 140), § 839 Rn. 314; *Papier* (Fn. 140), § 839 Rn. 323;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見解：BVerfG, BeckRS 2013, 56344 (Rn. 35); 惟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向來將其與法官獨立相並列：BGH, NJW 1968, 989 (unter III.2); 法國學說上的類似見解：MÈNURET (J.-J.), (註145), 10583, n° 7; 我國學說上多從前揭德國通說：翁岳生 (註128), 頁116; 董保城、湛中樂 (註128), 頁150; 葉百修 (註55), 頁117; 范文清 (註61), 頁39-40。

權」(Richterspruchprivileg)的用語¹⁴⁹。然而，姑且不論救濟基本權侵害之需求，由於法治國原則之內涵亦包括公權力造成權利侵害時的國家責任，故同樣植基於法治國原則之法安定性要求並無法單獨正當化對於國家責任之廣泛限制，其相對應的具體法律規定及其解釋仍不能牴觸憲法之最低要求¹⁵⁰。依此，關於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定法官「執行(審判)職務」之免責要件，論者認為解釋上並不及於不生實質確定力之行為(如：指定審判期日、傳喚被告與實施拘提、羈押等)¹⁵¹，頗值參考。

(二) 審判法官特權之射程範圍

以上開討論為基礎，針對法院遲延審判之情形，應難認有何免除國家賠償責任之憲法上正當性。申言之：此時應賠償之義務人既(首先)係國家而非個別法官，肯定不適時審判的國家責任並無害及法官之「獨立性」的疑慮。此事並不因國家賠償責任訴訟上可能認定其違反促進程序義務，而得生影響於該法官之職務評價一事¹⁵²而有所不同，蓋以：以防免拖延辦案為目的所為之監督、就辦案期間依客觀之標準予以考核等司法行政行為，並未涉及審判之核心範圍，自無妨害「審判獨立」之虞¹⁵³。另一方面，因為法院是否在適當期間內完成審判與裁判本身之正確性並無關連¹⁵⁴，故國家賠償責任訴訟上就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是否因法院之行為受侵害之判斷，實未直接或間接地重新審查已確定之法律關係¹⁵⁵，在此限度

149 *Papier* (Fn. 140), § 839 Rn. 323; *Wöstmann* (Fn. 140), § 839 Rn. 314 a.E.

150 *Breuer* (Fn. 35), S. 193; 參見前揭註53。

151 范文清(註61)，頁49-50。

152 參見 *Wilhelm Wolf*, *Amtshaftung wegen überlanger Verfahrensdauer eines Zivilprozesses*, LMK 2011, 317778 (unter 3).

153 司法院釋字第530號解釋理由書。

154 參見前揭註52。

155 所謂「直接」涉及原裁判內容者，係以法院認事用法的錯誤為國家責任成立事實的情形，如歐洲法院所謂「法院明顯地(offenkundig)錯誤適用歐盟法的國家責任」(EuGH, NJW 2006, 3337)；所謂「間接」涉及原裁判內容者，係主

內，對於司法不法之國家責任的追究，亦不背反於「法安定性」之要求。

承此，可以確認的是：「審判法官特權」之射程範圍，並不及於法院指揮、管理程序不符適時審判要求的案型；此時，植基於憲法的國家賠償責任，毋寧必須在與其他國家不法責任相同的程度上被充分確保，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應無適用之餘地。在比較法的觀察上，此除合致於德國民法第839條第2項第2句之規定¹⁵⁶外，承認遲延審判本身直接構成國家責任一事，亦見於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第1項的無過失補償模式¹⁵⁷以及法國實務上就其法院組織法第L. 141-1條「拒絕審判」要件之解釋論¹⁵⁸。

在我國憲法第24條以國家賠償法作為具體請求規範的法制狀態上，上開結論必須透過制定法的「合憲性解釋」（含：法之續造）以達成。就此，於本段之論述脈絡下，應說明者有二：第一，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雖未設有如前揭德國民法第839條第2項第2句之規定，將法官「違背職務義務而拒絕或遲延行使職權」之情形，排

張法院未盡闡明義務造成裁判因未斟酌當事人尚得提出之訴訟資料而生對其不利的結果，而提起國家賠償訴訟的情形，此時，在闡明規範（如：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99條）是否遭違反即責任是否成立一事的認定上，固然僅需考量當時的程序狀態，但就責任範圍的判斷則必然包含原裁判內容是否因此會有所不同，原紛爭因而再燃，參見 *Wöstmann* (Fn. 140), § 839 Rn. 329; *Papier* (Fn. 140), § 839 Rn. 328. 相對於此，由於適時審判請求權的侵害與法院為如何之本案裁判間，並無因果關係，其在國家責任程序上被主張一事，即無重啟紛爭的疑慮，此觀德國民事訴訟法第580條第8款所定之再審事由，在解釋論上不包含經歐洲人權法院確認之適時審判請求權侵害一事（參見 *Johann Braun*, *Restitutionsklage wegen Verletzung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NJW* 2007, S. 1620 (1622)) 益明。

156 德國民法第839條第2項：「公務員就訴訟案件為判決時，以該職務義務之違反構成犯罪行為為限，就因此所生之損害負責。本項規定不適用於違背職務義務而拒絕或遲延行使職權者。」

157 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第1項：「程序關係人因不適當之法院程序期間而受不利益者，應予適當補償。程序期間之適當性應依個案情形判定，特別應考慮程序之複雜性與重要性以及程序關係人與第三人之行為。」

158 參見前揭註131、132。

除於同條項第1句的適用範圍之外，並回歸德國民法第839條第1項的一般規定，惟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稱之「審判」職務，既係指裁判行為及所有客觀上以作成裁判為目的所採取之措施（即：法院為獲取實體裁判之基礎所進行的準備、解明事案、調查證據等行為）¹⁵⁹，而法官拒絕或遲延行使職權之「不作為」，正非屬前述定義下之「審判」行為，其不受免責規範所保障一事，實屬事理之當然，無待法律明文¹⁶⁰，故諸如法官未於鑑定意見作成後或上訴理由書提出後速定言詞辯論期日等不作為¹⁶¹，自始不該當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審判」要件。第二，相對於法官之全然不作為或遲延作為，在解釋論上容易產生困難的是其「作為」導致程序延滯的情形，因為此種所謂隱藏性程序延滯行為（如：進行不必要的證據調查、為不必要的闡明處置等）¹⁶²往往屬於「審判」職務之範疇，縱其可能造成審判之遲延，似亦應依照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受到審判法官特權之保護¹⁶³。然而，在國家賠償責任訴訟係以判決內容之錯誤作為請求原因的情形中，上開將隱藏性程序延滯行為涵攝入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審判」要件一事，固有其合理性，蓋准駁證據調查之聲明等訴訟指揮措施與判決本身，係在責任法上立於一個不可區別的緊密關係¹⁶⁴；可是，在國家賠償責任訴訟係以過長之審判期間作為請求原因的情形中，指摘隱藏性程序延滯行為違反法院之程序促進義務、主張該等行為與遲延審判間存在因果關係等事，並

159 參見范文清（註61），頁46-49；葉百修（註55），頁118-119；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一貫見解，僅參見BGH, NJW 1966, 246 (unter 2); BGH, NJW 1968, 989 (unter II.2).

160 *Wöstmann* (Fn. 140), § 839 Rn. 334; 贊同見解：BGH, NJW 2011, 1072 (Rn. 12).

161 參見BGH, NJW 2011, 1072 (Rn. 22, 27).

162 *Brüning* (Fn. 106), S. 1094, 1095.

163 BGH, NJW 2011, 1072 (Rn. 13); 其批判：*Stefan Muckel*, Amtshaftungsansprüche nach überlanger Dauer eines Gerichtsverfahrens, JA 2014, S. 398 (399); *Breuer* (Fn. 108), Art. 13 Rn. 60.

164 BGH, NJW 2011, 1072 (Rn. 13).

不等同對判決本身之攻擊¹⁶⁵，故針對前一情形所發之論據實不能援用於後一情形¹⁶⁶，而存在一個法律規定超出其規範目的之不完全性（*planwidrige Unvollständigkeit*），即：隱藏的法律漏洞¹⁶⁷，毋寧應鑑於憲法（及公政公約）救濟基本權侵害的要求，就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3條之適用範圍予以「目的性限縮」，承認隱藏性程序延滯行為亦得構成國家賠償責任之成立基礎¹⁶⁸。

參、國家賠償責任因法院遲延審判之成立與效果

於確認法院審判遲延時事後救濟之必要性（上述貳、二）與請求國家賠償時審判法官特權之不適用性（上述貳、三）後，關於我國國家賠償制度能否有效彌補當事人因審判未於適當期間內完成所蒙受之不利益一事，尚取決於該法第2條第2項之具體運用。就此，前揭條文解釋上沒有疑義的是下述構成要件：第一，審理案件之法官係屬「公務員」且其審理行為係屬「公權力」之行使¹⁶⁹；第二，適時審判請求權本身作為憲法上程序基本權的一個面向並具有直接

165 *Brüning* (Fn. 106), S. 1094, 1098: 「[民法第839條第2項第2句]包含了程序之延遲係出於多餘行為的情形。因此，並非只有單純不作為可受制裁，為準備判決所為之程序指揮行為亦屬之，換言之：行為的錯誤並不被審判法官特權所保護，因為此時並非指摘判決之不正確，而是認事用法過程之不經濟」；同旨：參見 *Jürgen Blomeyer*, *Die Haftung des Staates für die Verzögerung von Zivilprozessen*, NJW 1977, S. 557.

166 相同見解：*Papier* (Fn. 140), § 839 Rn. 327.; *Dieter Remus*, *Amtshaftung bei verzögerter Amtstätigkeit des Richters*, NJW 2012, S. 1403 (1405).

167 *Karl Larenz/Claus-Wilhelm Canaris*,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3. Aufl., 1995, S. 191 ff.

168 參見BVerfG, BeckRS 2013, 56344 (Rn. 34 ff.)，該院認為造成程序延滯的審判作為雖屬責任特權之範圍，其遲延結果仍應成為判斷法院是否履行其促進程序義務之基礎；其評論：*Steinbeiß-Winkelmann* (Fn. 69), S. 1277 f.

169 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10版，頁761（2007年）；董保城、港中樂（註128），頁57；葉百修（註55），頁115。

拘束司法者之效力，當屬「人民之自由或權利」¹⁷⁰；第三，對於此項權利，基於法律之規定或憲法（及公政公約）之直接要求（上述壹、二），法院對當事人負有不得以作為或不作為加以侵害的促進程序（訴訟）義務，換言之：此時存在一個「具備第三人關連性（Drittbezogenheit）的職務義務（Amtspflicht）」¹⁷¹。因此，在法院遲延審判是否成立國家賠償責任的認定上，首先構成困難的是適時審判請求權有無遭受「侵害」，以及此項侵害能否歸因於法院職務義務之「不法」履行或不履行（下述參、一）；其次則是如何判斷法院在主觀上有無「故意或過失」，並應一併檢討在各別法官並無主觀歸責事由時，是否能透過組織歸責事由追究其所屬或上級司法機關的責任（下述參、二）。此外，就其法律效果而言，尚應討論同法第5條所定「損害」之內涵與「賠償」之範圍（下述參、三）；最後則宜說明行使國家賠償請求權程序要件亦不能對受害人此項救濟權之實現造成不當的限制（下述參、四）。

一、法院就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的不法侵害

認定法院之審判未於適當期間內完成一事，如後所述，原則上即內含其不法違反義務之評價¹⁷²，故就國家賠償責任之成立（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而言，應以適時審判請求權是否遭侵害作為審查之起點。就此，由於程序基本權並不僅保障程序之迅速性，

170 吳庚（註169），頁764；陳敏（註54），頁1166：「所謂之『自由』或『權利』，係指憲法及法律所保障之各種自由或權利，不以法律賦予一定之名目者為限。」

171 *Brüning* (Fn. 106), S. 1096; *Wöstmann* (Fn. 140), § 839 Rn. 334; 我國學說上以「違反具第三人關連性之職務義務」作為判斷國家賠償法上之「不法性」要件者，如：陳敏（註54），頁1157-1159；葉百修（註55），頁163-165；董保城、湛中樂（註128），頁101-106；陳清秀，國家賠償實務之研討（上），月旦法學雜誌，141期，頁178（2007年）；亦參見李建良，公法上權利的概念、理論與運用，月旦法學教室，99期，頁34（2011年）；關於認定職務義務之「第三人關連性」的「保護規範理論」，參見翁岳生（註128），頁114-113；司法院釋字第469號解釋。

172 參見*Remus* (Fn. 166), S. 1405; *Althammer* (Fn. 45), S. 448.

而亦包含其完整性、正確性，故不能且不宜以一個固定期間（如：限8年內終結案件）作為判斷「適時審判」之絕對標準¹⁷³，毋寧是，除審理期間之長度顯然逾越程序公正性所容許者外（如：案件繫屬逾6年尚未作成第一審裁判、訴訟救助聲請逾5年始作成第二審裁判）¹⁷⁴，應針對具體案件之適時性為「整體」（*in globo*）及「個案」（*in concreto*）之認定¹⁷⁵。申言之：就整體認定而言，因為程序前階段的審判遲延可能藉由後階段或上級審的加速審判予以平衡，而使紛爭最終能在適當期間內完成，故應整體考量自程序繫屬時起至終審法院為裁判時止所經過的時間¹⁷⁶，而原則上不分段為之¹⁷⁷；不過，如國家賠償訴訟係針對尚未終結之程序所提起者¹⁷⁸，則應整體考量後續可能採取的促進程序措施，而為預測性判斷¹⁷⁹。就個案認定而言，由歐洲人權法院提出而被兩公約人權委員

173 參見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立法理由，Regierungsentwurf, BT-Drucks. 17/3802, S. 18；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貫見解：BVerfG, NJW-RR 2010, 207 (Rn. 20)；歐洲人權法院亦同，參見Meyer (Fn. 67), Art. 6 Rn. 76 f.；惟應注意者係：歐洲人權法院雖曾於涉及刑事程序上人身自由之限制的案件（Panchenko v. Russia, App. No. 45100/98,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8148>、Nazarov v. Russia, App. No. 13591/05,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95873>）中附帶提及得概略地以1年為基準，惟此既非絕對標準，亦不能適用於大多數之案件，參見Meyer-Ladewig (Fn. 20), Art. 6 Rn. 199.

174 參見Uhle (Fn. 1), § 129 Rn. 66; Meyer (Fn. 67), Art. 6 Rn. 77.

175 相同見解：沈冠伶（註16），頁7。

176 參見Guincho v. Portugal, App. No. 8990/80,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57497>.

177 BGH, NJW 2014, 1967 (Rn. 39); Cour de cassation [Cass.] [supreme court for judicial matters] 1e civ., Mar. 25, 2009, n° 07-17576; 惟在拘束人身自由的情形，歐洲人權法院曾例外認為儘管3年又5個月的（刑事）訴訟整體而言並非過長，但就其中法院超過2年的不作為，仍抵觸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之適時審判要求，Gjashta c. Grèce, No. 4983/04,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Oct. 18, 2007),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82827>.

178 為有效救濟已發生之適時審判請求權侵害，歐洲人權法院向來允許就繫屬中之過長訴訟提起人權訴願，參見Marques Gomes Galo c. Portugal, No. 35592/97,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Nov. 23, 1999),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2980>.

179 參見BGH, NJW 2014, 939 (Rn. 42)，該院以「審判程序之延滯是否已屬不可逆且已終局地造成當事人之不利益」為基本標準。

會¹⁸⁰、德國聯邦憲法法院¹⁸¹、法國最高法院¹⁸²等繼受之下述具體判準，甚值注意¹⁸³，即：(1) 案件之複雜程度、(2) 當事人就系爭案件所牽涉之利害關係、(3) 當事人及(4) 該管公權力之行為態樣¹⁸⁴。依此，(1) 在涉及複數徵收標的、需於外國為證據調查、有多數被告或基於同一原因之訴訟大量繫屬於同一法院¹⁸⁵等情形，由於案件具有相當複雜性，應給予較長的審判期間¹⁸⁶，相對於此，企業債務清理事件則無本質上的困難性，不能當然正當化審判期間之延長¹⁸⁷；(2) 在涉及親權、面會交往權、行為能力之家事紛爭、涉及給付薪資、解雇保護之勞資爭議，或影響當事人之人格發展¹⁸⁸等情形，因為當事人對於程序的迅速進行有重大利益，自應嚴格認定審判期間之適當性¹⁸⁹，相對於此，訴訟標的價額之高低則未必具多大意義¹⁹⁰；(3) 在民事程序上，當事人有其促進程序協力義務，其違反（如：數次無理由地聲請法官迴避、於言詞辯論前一日提出書狀、多次聲請延展期間、拒絕提出其所持有之證明文書等行為¹⁹¹）

180 IDOUX (P), MILANO (L.), (註4), n° 86; HENNEBEL (L.), (註62), n° 246.

181 Uhle (Fn. 1), § 129 Rn. 66.

182 Cour de cassation [Cass.] [supreme court for judicial matters] 1e civ., Feb. 20, 2008, n° 06-20384.

183 同旨：沈冠伶（註16），頁8-9。

184 歐洲人權法院一貫見解，僅參見Herbst v. Germany, App. No. 20027/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8946>; Gräßer v. Germany, App. No. 66491/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7247>.

185 參見BGH, NJW 2015, 1312 (Rn. 32).

186 參見Meyer-Ladewig (Fn. 20), Art. 6 Rn. 200之整理。

187 Laine c. France, No. 41476/98,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Jan. 17, 20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4573>; 惟我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則給予破產及公司重整事件較（通常訴訟事件）長的結案期限。

188 參見Herbst v. Germany, App. No. 20027/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8946>.

189 參見Meyer-Ladewig (Fn. 20), Art. 6 Rn. 205之整理。

190 參見STRICKLER (Y.), (註46), n° 21；惟我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10點（十一）則以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高於新臺幣5,000萬元為延長結案期限之要件（之一）。

191 參見Deumeland v. Germany, 8 Eur. H.R. Rep. 448 (1986); Herbst v. Germany, App.

所造成之程序延滯，原則上不能歸責於法院，而可正當化審判期間之延長¹⁹²，至於上訴制度的正當使用並不屬之，自不待言¹⁹³；(4) 在民事程序上，法院負促進程序之義務¹⁹⁴，如受訴法院未能合義務地行使其權限（如：儘早為闡明處置、對逾時提出之攻防方法施以失權制裁）以加速審理之進行，縱當事人有惡意拖延審判的情事，仍不能寬認審判期間之適當性¹⁹⁵，在此限度內，各該案件類型統計上之平均結案時間¹⁹⁶或司法院所定之結案期限（如：民事通常程序第一審為1年4個月）¹⁹⁷，亦得作為認定「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的評價根據事實¹⁹⁸，至於受訴法院違反其促進程序義務，是否出於法官員額不足、案件負擔過重或法院財政短絀等原因，在所不問，蓋國家有義務創設一個能實現適時審判之司法制度¹⁹⁹。

承上所述，關於法院審判是否適時或當事人之適時審判請求權是否受侵害，判斷之重要基準之一係在於個別法官、管轄法院、司

No. 20027/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8946>.

192 Gergouil c. France, No. 40111/98,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Mar. 21, 2000),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3279>; STRICKLER (Y.), (註46), n° 30.

193 Cour de cassation [Cass.] [supreme court for judicial matters] 1e civ., Feb. 20, 2008, n°06-20384.

194 參見許士宦（註35），頁20-27、44-55；Othmar Jauernig/Burkhard Hess, Zivilprozessrecht, 30. Aufl., 2011, § 28 Rn. 14.

195 Herbst v. Germany, App. No. 20027/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8946>；亦參見FRICERO (N.), (註5), n° 212.162 *in fine*.

196 參見Christine Steinbeiß-Winkelmann/Tim Sporrer, Rechtsschutz bei überlangen Gerichtsverfahren, NJW 2014, S. 177 (182)；應注意者係：BGH, NJW 2014, 220 (Rn. 26) 強調，統計上的平均數據不能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而必須為個案審查。

197 參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2點。

198 關於規範性要件之舉證模式，參見許士宦，不當得利返還訴訟中無法律上原因事實之舉證責任分配，收於：爭點整理與舉證責任，頁248-251（2012年）。

199 歐洲人權法院的一貫見解，僅參見Fernandes c. Portugal, No. 47459/99,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Apr. 18, 20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4994>；Schilling (Fn. 28), Rn. 544:「基於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國家亦有促成其法院遵守該公約規定之組織義務（Organisationspflichten）」。

法機關乃至於國家本身之行為是否合於迅速性的要求（前揭第（4）標準），換言之，認定審判期間係屬不適當一事，必定伴隨著公權力行使具義務違反性之評價。在此意義上，應可肯定：在判斷法院之審判是否「侵害」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的同時，亦一併判斷法院是否違反其職務義務而使該侵害具「不法性」。因此，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以特定職務行為作為判定國家責任之必要條件，而非僅以侵害結果之存在為已足的規範結構，與憲法（及公政公約）就此一基本權侵害所要求的國家不法責任，並不相衝突²⁰⁰。具體而言，於判斷受訴法院指揮、管理程序是否及如何造成審判之不當延滯時，固然必須承認法院有一定的裁量空間²⁰¹，只要其在考量良善司法運作的需求下仍屬合理者²⁰²，即不能指為不法²⁰³並進而認定有逾時審判的情事，蓋此時縱程序之期間有所偏離於理想狀態，仍並非當事人所不應容忍者²⁰⁴。惟不能忽略的是：法院前揭裁量空間將隨著時間之加長而萎縮，易言之，法院採行促進程序措施的必要性會隨審理期間之經過而提高²⁰⁵。依此，不僅是法院長時間

200 相對於此，因為德國法上之國家賠償責任係以職務義務之違反為核心，而明確採取一個以行為（Handlung）而非以結果（Erfolg）為導向的規範模式，故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審判遲延的概括確認並不能取代具體義務違反行為的認定，BGH, NJW 2011, 1072 (Rn. 17)，此時，如何透過釋義學的調整使國家責任能有效救濟過長之審判期間，即成問題，Breuer (Fn. 35), S. 331 ff；在此背景上，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明白地不以法院之職務義務違反為補償請求權之客觀構成要件，Regierungsentwurf, BT-Drucks. 17/3802, S. 42。

201 參見前揭註39；惟此非屬自由裁量，而為合義務裁量，參見Leipold (Fn. 7), Vor § 128 Rn. 136 f.

202 參見BGH, NJW 2011, 1072 (Rn. 14); Breuer (Fn. 35), S. 332.

203 關於裁量瑕疵與國家賠償，僅參見翁岳生，行政法與國家賠償法，收於：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頁200；葉百修（註55），頁158-159。

204 參見BGH, NJW 2014, 220 (Rn. 31); Michael Dietrich, Rechtsschutz wegen überlanger Verfahrensdauer nach §§ 198 ff. GVG, ZZP 127 (2014), S.169 (182 f.).

205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一貫見解，僅參見BVerfG, BeckRS 2013, 56344 (Rn. 32)、參見前揭註40；關於裁量減縮理論與國家賠償，參見蕭文生，裁量萎縮至零與怠於執行職務——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711號民事判決，法令月刊，66卷3期，頁16-17（2015年）。

之不作為²⁰⁶、未即時指定言詞辯論期日²⁰⁷或未適時限期命當事人提出書狀²⁰⁸等，應被視為不法，在審理時間之長短相當程度取決於法院及當事人以外之第三人（如：鑑定人）的情形，如法院未於選任鑑定人時考量其預期之處理期間、依需要同時選任數鑑定人或於鑑定人遲不提出鑑定意見時加以監督並指定鑑定期限（德國民事訴訟法第411條第1項參照），亦屬不合義務之程序處置²⁰⁹，且法院未採取適當措施使鑑定人遵守鑑定期限之命令者，亦同²¹⁰。此外，不論是言詞辯論期日間相隔時間之長短²¹¹或言詞辯論之次數本身²¹²，均得成為評價法院是否違背促進程序義務之根據事實。

二、法院審判遲延的可歸責性

於認定審判期間是否逾越適當期間時，應附帶判斷受訴法院之審理活動是否違反促進程序義務，故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所定「侵害自由或權利」與「不法」等二要件基本上會同時該當，已如上述（參、一）。此時，當事人受適時審判之基本權既已受法院不法侵害，程序上又別無排除侵害之可能性，即必須賦予事後復原之救濟機會，亦見前述（貳、二）。然而，我國國家賠償法前揭條文係以主觀上歸責事由（即：故意、過失）的存在為要件，而限制憲法上就基本權侵害所保障的國家責任，是否妥適，頗值懷疑。就此，從立法論（*de lege ferenda*）的角度而言，因為法治國原則未必

206 Ficara v. Italy, 196-A Eur. Ct. H.R. (ser. A) (1991).

207 Van Der Kar et Lissaur Van West c. France, No. 44952/98 et 44953/98,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Mar. 19, 20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4871>.

208 Gozalvo c. France, No. 38894/97,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Nov. 9, 1999),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2909>.

209 BVerfG, NJW 2011, 214 (unter II.2.c); 惟我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第10點（六）一概以未能於3個月內獲得鑑定報告一事作為延長結案期限之事由。

210 D.E. v. Germany, App. No. 1126/05,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93610>.

211 Pires c. Portugal, No. 43654/98,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Oct. 25, 20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4321>.

212 Buchholz v. Germany, 42 Eur. Ct. H.R. (ser.A) (1981).

要求國家負有一個超出侵害禁止及結果排除的無過失賠償責任，而係賦予立法者一定的形成自由²¹³，故難以認為主觀歸責要件之設計係屬違憲²¹⁴。不過，就本文所探討之議題，從解釋論（*de lege lata*）的角度而言，由於國家賠償係救濟適時審判請求權侵害之最有效途徑，應依合憲性（或合公約）之解釋方法，放寬「過失」要件該當性之認定標準，而具體採取實體法上「過失客觀化」或程序法上「舉證責任轉換」手段²¹⁵，以符合憲法（及公政公約）之保障程序基本權之意旨²¹⁶。申言之，關於前一手段，並不考慮公務員個人之知識能力，而以「公務員之行為是否符合一般忠於職務之公務員所被期待者」為注意義務之標準²¹⁷，此與以「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裁量權）是否逾越法之界限或背離法之目的」為不法性之標準一事²¹⁸，殆無實質上之不同（所謂「過失與違法關係之一元化」）²¹⁹；關於後一手段，除鑑於國家機關與被害人間知識、能力之落差及證據偏在之情形外²²⁰，亦應基於課予公務員忠實執行法定職務義務之規範目的（我國公務人員服務法第1條），適用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²²¹，將（無）過失之舉證責任轉換由國家機關負擔（所謂「過失推定」）²²²。依此，在當事人以法院審判遲延為

213 參見 *Papier* (Fn. 129), Art. 34 Rn. 217.

214 葉百修（註55），頁5。

215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36號民事判決：「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所定之國家賠償責任，固採過失責任主義，且得依『過失客觀化』及『違法推定過失』法則，以界定過失責任之有無……」。

216 參見 *Taron v. Deutschland*, No. 53126/07, *Europäischer Gerichtshof für Menschenrechte* [EGMR], NVwZ 2013, 47 (May 29, 2012)；在德國，一般認為透過可歸責事由的客觀化與去個人化（*Entindividualisierung*），國家賠償實際上已趨近於無過失責任，僅參見 *Breuer* (Fn. 35), S. 259.

217 葉百修（註55），頁203；蕭文生，國家賠償責任之歸責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36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21期，頁91-92（2013年）。

218 *Papier* (Fn. 140), § 839 Rn. 198; *Ossenbühl* (Fn. 48), S. 43 f., 46.

219 參見 *Wöstmann* (Fn. 140), § 839 Rn. 194；葉百修（註55），頁210。

220 參見葉百修（註55），頁219。

221 關於其運用方針，參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08號民事判決。

222 參見蕭文生（註217），頁92-93；陳敏（註54），頁1165；吳庚（註169），頁

由所提起之國家賠償訴訟上，如受訴法院就「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含：原法院促進程序義務之違反）已形成積極心證，則或得同時認定可歸責事由之存在²²³，或得曉諭被告機關就其「無過失」為舉證²²⁴。

儘管如此，如法院個別審理活動違背促進程序義務所造成之審判遲延，係出於法官員額不足或其他支援機制（如：法官助理、法律外專業人員、法院辦公設備）之欠缺等理由，亦即，當事人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係肇因於法官承受過重的案件負擔者，實難以認為受理系爭案件之法官有何主觀上可歸責性²²⁵，似不得不否定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過失」要件之該當性。然而，正如前述（貳、二及參、一），國家本負有確保審判在適當期間內完成之憲法（及公政公約）上義務，故縱受訴法院主觀上已盡力促進程序，仍無法避免個案程序過於冗長者，亦非免除國家救濟此一基本權侵害義務之正當理由，此時，為避免權利保護之漏洞，應採取「組織過失（歸責）」理論²²⁶，不以個別法官有可歸責性為必要，而就司法（行政）機關整體（即：該法官所屬法院、上級法院、司法院）判斷「過失」之有無。亦即，在受訴法院主觀上已無法確保適時審判

764；葉百修（註55），頁220另指出我國實務上肯定「過失推定」法理之傾向。

223 參見Dietrich (Fn. 204), S. 181.

224 參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36號民事判決：「……倘人民已主張國家機關有違反作為義務之違法致其受有損害，並就該損害為適當之證明時，揆之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自應先由國家機關證明其有依法行政之行為，而無不作為之違法，始得謂為無過失……」。

225 Althammer (Fn. 45) S. 446, 448; Brüning (Fn. 106), S. 1094, 1096; 惟Breuer (Fn. 35), S. 335認為此時實已不該當「違反職務義務」要件。

226 參見Ossenbühl (Fn. 48), S. 77；董保成、湛中樂（註128），頁146；陳敏（註54），頁1165；陳清秀（註171），頁181；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3年度上國字第3號民事判決：「行政本具有積極主動處理公共事務，形成社會生活，從而實現國家目的之功能，對於公共事務之處理，主管機關之人力、預算如不足以因應法定職務所需，係屬機關內部如何逐步調度、編列之問題，不能據為對外主張免責之事由」。

的情形，應承認審判法官（法庭）之所屬法院、上級法院或司法院，負有及時投入適當措施（如：事務分配之調整²²⁷、法官助理之增聘、辦公設備之添購、預算之妥適分配等）以加速審判之義務²²⁸，且肯定該義務亦具有保護具體當事人之適時審判請求權，而非僅指向公益的性質（所謂「第三人關連性」）²²⁹。若然，則司法機關怠於履行上述義務一事，既構成違背職務義務的不法性，亦存在組織上之可歸責性²³⁰。依此，在當事人以法院審判遲延為由所提起之國家賠償訴訟上，如受訴法院就「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已形成積極心證，被告機關亦應主張、舉證其無違反組織上之促進程序義務即「無組織過失」。就此而言，國家賠償責任以權利侵害為中心，內含不法性與有責性的審查結構，於「個別審理活動延滯程序」及「司法組織未合理應對具體審判遲延」等兩種情形，並無二致。

三、法院審判遲延的損害賠償

依照我國國家賠償法第7條第1項規定，賠償方法係以金錢賠償為原則；而其範圍則依照同法第5條適用民法第216條及第192條至

227 惟林明鏘（註144），頁9-10批判我國法官法第21條第2項授予法院院長「得對該院法官遲延未結之案件，提經法官會議決議改分同院其他法官辦理」之權限，認為其可能侵害審判獨立；就此，本文認為，如將該條所謂「遲延未結」限縮於「當事人之適時審判請求權有受侵害之虞」的情形，而非逕以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所定之審理期限為據，似得緩和上開質疑。

228 參見BVerfG, NJW-RR 2010, 207 (Rn. 27, 32).

229 參見BGH, NJW 2007, 830 (Rn. 20 ff.)；應注意者係：本裁判雖係涉及司法事務官所處理之預告登記事件，惟亦應適用於包含審理活動在內的所有司法行為，參見Christine Steinbeiß-Winkelmann, Überlange Gerichtsverfahren – der Ruf nach dem Gesetzgeber, ZRP 2007, S. 177 (180)，氏並認為，此事能提高德國國家責任法作為事後救濟審判遲延措施的效率。

230 參見Christian Waldhoff, Amtshaftung – Enteignungsgleicher Eingriff wegen Verzögerung von Eintragungen im Grundbuch, JuS 2008, S. 645 (646)；參見Fritz Ossenbühl, Anmerkung zu BGH, Urteil v. 11.1.2007 – III ZR 302/05, JZ 2007, S. 690 (690 f.)；Brüning (Fn. 106), S. 1096; Remus (Fn. 166), S. 1406.

196條等規定為之²³¹。依此，於程序當事人之適時審判請求權遭受法院侵害時，國家應就其所受財產上損害（含：所失利益）負擔賠償責任，亦即：所有因為法院審判遲延而生之實質不利益（如：因參與或為阻止過長之程序而多支出之勞費²³²、債務人於審判期間陷於不能清償而無法完全滿足債權²³³、因債務清理程序之拖延導致可變價之財產貶損²³⁴等），皆屬應受填補者。惟請求國家賠償之人就權利的不法侵害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應負主張及舉證責任²³⁵，僅空言主張系爭法律關係遲不確定導致職業生涯無法順利發展而生收入之減少者，尚不能謂已提供法院充分判斷其賠償適格性的基礎²³⁶。就此，應附言者係：法院裁判之結果可能因適時審判而有所不同一事，原則上不能納入此處國家賠償訴訟之審查範圍（上述貳、三、2），並非得請求賠償之對象²³⁷。

相對於此，伴隨於法院程序之拖延而生的非財產上損害，亦即：因法律關係的不確定性及未來計畫的困難性所致之精神不安、恐懼、沮喪或不適等心理上效果²³⁸，縱其發生具高度蓋然性而應被推定為當事人所受之損害²³⁹，在我國國家賠償法前揭規範架構下，

231 陳敏（註54），頁1186-1187。

232 Maurer v. Austria, App. No. 50110/99,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0016; LG München I, BeckRS 2011, 11982 \(unter I.1.\(3\), \(5\)\)](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0016; LG München I, BeckRS 2011, 11982 (unter I.1.(3), (5))).

233 BGH, NJW 2014, 939 (Rn. 26), 本案之請求權基礎為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OLG Hamm, BeckRS 2010, 01415，本案之請求權基礎為德國民法第839條合併憲法第34條。

234 Laine c. France, No. 41476/98,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Jan. 17, 20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64573>.

235 *Wöstmann* (Fn. 140), § 839 Rn. 228; 葉百修（註55），頁231。

236 Herbst v. Germany, App. No. 20027/02,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8946>.

237 歐洲人權法院一貫見解，僅參見 *Sürmeli v. Deutschland*, App. No. 75529/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5689>; *Gräßer v. Germany*, App. No. 66491/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7247>.

238 參見 *Meyer-Ladewig* (Fn. 20), Art. 41 Rn. 9 f.

239 參見 *Scordino v. Italy*, App. No. 36813/97,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2925>；惟歐洲人權法院亦不否定審判延滯不生或僅生微小之非財產上損害的情形。

礙於我國民法第18條第2項及第195條之規定，僅於審判遲延本身同時構成人格權或身分權之侵害時，始能判給慰撫金²⁴⁰。然而，法院未盡促進程序義務一事多僅屬程序瑕疵，除少數例外情形（如：酌定親權事件同時涉及家庭生活權的保障²⁴¹、賠償愛滋病毒感染事件同時涉及剩餘生命的長短與品質²⁴²），並未侵害當事人之人格權或身分權，故當事人所蒙受之精神痛苦即不能依法請求金錢賠償²⁴³。若然，則法院未於適當時間內完成審判而對當事人所造成的此種主要損害²⁴⁴，原則上即無法受到填補。在此限度內，難謂我國現行國家賠償制度能有效救濟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²⁴⁵，而宜透過解釋論上的調整以符合憲法上法治國原則或訴訟權保障（及公政公約上有效權利救濟）的要求²⁴⁶。申言之：縱認為我國民法第18條第2項之

240 我國民法學界通說：王澤鑑，損害概念及損害分類，月旦法學雜誌，124期，頁209-210（2005年）；國家賠償法學界亦同：陳敏（註54），頁1187；陳清秀（註171），頁203。

241 Bergmann c. République tchèque, No. 8857/08,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Oct. 27, 201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07170>.

242 X v. France, 236 Eur. Ct. H.R. (ser.A) (1992).

243 參見Remus (Fn. 166), S. 1408; Breuer (Fn. 35), S. 341.

244 Ommer v. Germany, App. No. 26073/03,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89533>: 「……於有關審判時間長度的案件中，[人權]訴願人主要遭受此類[非財產上]損害。」

245 參見Stürmeli v. Deutschland, App. No. 75529/01,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5689>; Gräber v. Germany, App. No. 66491/01, at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7247>; Ommer v. Germany, App. No. 26073/03,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89533>，於此等裁判中，歐洲人權法院基於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參見公政公約第2條第2項第1款）所內含的彌補非財產上損害要求（參見Breuer (Fn. 108), Art. 13 Rn. 38），指摘德國國家賠償責任規範（民法第839條、基本法第34條）之不足。

246 在德國，有主張應就德國國家責任規範採取合歐洲人權公約之解釋（menschenrechtskonforme Auslegung），而承認超出德國民法第253條所定範圍外之非財產損害賠償者：Burkhard Hess, Staatshaftung für zögerliche Justiz – ein deutsch-österreichischer Rechtsvergleich, in: Bittner/Klicka/Kodek/Oberhammer (Hrsg.), Festschrift für Walter H. Rechberger zum 60. Geburtstag, 2005, S. 211 (226)；在法國，向來以歐洲人權法院之判示為指標，認為法院審判遲延所造成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損害皆應賠償，參見SUDRE (F.), Droit international et européen des droits de l'Homme, *Juris-Classeur Libertés*, Fasc. 55, 2007, n° 186.

限制亦適用於非人格權之侵害²⁴⁷，且同項所謂之特別規定（如：同法第194條、第195條、第979條、第1056條第2項及第514條之8）具有類推禁止（Analogieverbot）之性質²⁴⁸，惟為避免基本權受公權力之侵害陷於未獲充分救濟的窘境，似應認為前揭限制僅適用於私法關係（如：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而不及於國家應就其不法行為負賠償責任之類型²⁴⁹。因此，就當事人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

247 孫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頁429-430（2014年）。

248 參見Hartmut Oetker, in: Krüger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d. II, 6. Aufl., 2012, § 253 Rn. 7, 27.

249 類似的論證係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自Ginseng案判決（BGH, NJW 1961, 2059）以來，於德國基本法第2條第1項合併同法第1條第1項所保障的一般人格權受侵害時，為避免基本權侵害欠缺制裁手段，承認在非財產上損害無法依其他方式得到彌補且一般人格權之侵害係屬重大的前提下，法院仍得判令金錢賠償的見解；此項推論一方面修正了同院先前於Herrenreiter案判決（BGH, NJW 1958, 827）中類推適用德國舊民法第847條（參見我國舊民法第195條）的論證，另一方面，同院其後（僅參見BGH, NJW 1995, 861 (unter IV.2 m.w.N.))亦補充地說明侵害一般人格權所生之非財產上金錢賠償性質上並非前揭條文意義上的痛苦金（Schmerzensgeld），而係基於救濟一般人格權侵害的憲法要求而具備撫慰（Genugtuung）及預防功能的金錢補償，亦參見王澤鑑，人格權法，頁491-492（2012年），在此限度內，該見解亦被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合憲（BVerfG, NJW 1973, 1221）；此一私法上就一般人格權侵害在一定條件下排除德國舊民法847條或現行民法第253條適用的結論及其理由，向來亦適用於國家賠償責任事件上（參見BGH, NJW 1981, 675 (unter III.c); BGH, NJW 2003, 3693 (unter IV.1.a); BGH, NJW 2005, 58 (unter 2.a)），因此，若公務員有責地違反職務義務而加損害於一般人格權者，雖非財產上損害，亦得請求金錢補償。就此，因為我國民法第195條規定得請求慰撫金之權利侵害已包含一般人格權，並無參照前述德國實務見解之結論的需求，惟其用以證成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限制規定之不適用性的主要理由，即：憲法救濟基本權侵害的要求，則在涉及國家賠償責任的限度內，應對我國法之解釋有指標作用。具體而言：至少就適時審判請求權受侵害致生非財產上損害的情形，我國國家賠償法準用民法的範圍亦必須合憲（及合公約）地加以限縮，而排除我國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95條之限制，使非財產上損害得直接適用國家賠償法第7條第1項獲得填補。此種著眼於我國國家賠償法與民法的準用結構所為之法律解釋，不但在方法論上有其正當性，蓋「準用」並不代表被準用規範不加區辨地全面「適用」，若後者有本質上不適合（unsachgemäß）規範前者之處，即應加以避免，參見Larenz/Canaris (Fn. 167), S. 81 ff.，而在本文探討議題的限度內，一般民事責任與國家賠償責任正具有本質上之差異；且相對於原樣移用前開德國聯邦最高法院於該國規範架構下所發之論理，亦至少有以下二個優點：第一，避免對民事損害賠償法採取超越法律（*praeter legem*）甚至

若於衡量系爭程序耗費之時間、其標的對當事人之重要性以及當事人有無拖延行為等事，而認定審判延滯程度重大時，宜直接依我國國家賠償法第7條第1項予以相當之金錢賠償²⁵⁰。

四、法院遲延審判之國家賠償責任的請求程序

為救濟程序當事人因法院遲延審判所蒙受之損害，應承認其國家賠償請求權，而實現該權利之程序，亦必須符合公正性之要求。申言之：就接近使用法院權之確保而言，受害人應得實際且有效地要求法院對於其賠償請求加以審判²⁵¹；又就公正程序請求權之保障而言，法院亦必須在適當期間內對於國家賠償責任之成立與否作成裁判²⁵²。在此意義上，我國國家賠償法第10條所定之先行程序，既旨在藉由賠償關係雙方間之協議，以謀求勞費之節省與訴訟之避免，且同法第11條亦設有協議期間之上限，並不能認為係對前揭賠償訴權造成不合比例之限制²⁵³。至於同法第9條第1項係以機關而非

抵觸法律 (*contra legem*) 的法之續造，參見 *Larenz/Canaris* (Fn. 167), S. 249 f.; 第二，避免在超越法律之法之續造範疇內面臨此際之賠償性質上是否係指向撫慰或預防功能而與我國民法上非財產損害之賠償有所不同的爭議，參見 *Jörg Neuner, Das Schmerzensgeld*, JuS 2013, S. 577 (583 ff.)

250 歐洲人權法院一貫見解，僅參見 *Meyer-Ladewig* (Fn. 20), Art. 41 Rn. 21；此標準之運用，亦不致發生法院恣意裁量而酌給過高金額疑慮，參見張永健、李宗憲，身體健康侵害慰撫金之實證研究：2008年至2012年地方法院醫療糾紛與車禍案件，臺大法學論叢，44卷4期，頁1785以下、1829（2015年）。

251 參見 *Lawyer Partners a.s. v. Slovakia*, App. No. 54252/07,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92959>.

252 參見 *Sartory c. France*, No. 40589/07,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Sep. 24, 2009),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94305>; *Palmero c. France*, No. 77362/11,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Oct. 3, 2014),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147444>；應附言者係：歐洲人權法院對於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13條之事後救濟逾時審判措施（如：法國法院組織法第L. 141-1條），仍在個案中審查賠償（或補償）數額之相當性與賠償請求程序之迅速性，參見 *Cocchiarella c. Italie*, No. 64886/01,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CEDH], (Mar. 29, 2006), <http://hudoc.echr.coe.int/eng?i=001-72928>.

253 參見董保城、湛中樂（註128），頁197-198；葉百修（註55），頁302-303。

逕以國家或公法人作為履行賠償義務之主體，則由於「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何往往不易認定，致生國家賠償訴訟因被告不適格而遭駁回的危險，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²⁵⁴。就此，因為法院審判是否逾越適當期間一事係以整體判斷為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個案審查個別法官或司法（行政）組織有無違反促進程序之職務義務及有無可歸責事由（上述參、一及二），常會牽涉複數行為主體（即：各級法院法官或院長）及多數機關（即：各級法院），故在立法論上不宜概括地以特定法院（如：終審法院）為負賠償義務之機關²⁵⁵，而在解釋論上亦必須區別情形以決定賠償義務機關：（1）在程序係終結於地方法院（含：高雄少年法院、智慧財產法院）或長期停滯於特定法院（含：全國各法院）的情形，因原則上不涉及複數行為主體或機關，得以該法院為賠償義務人；（2）在程序遲延顯然因特定法官（法庭）之審理活動（含：作為、不作為）所生的情形，因主要爭點在於其審理活動之不法性，得以其所屬法院為賠償義務人；（3）除前述情形外，因遲延審判之評價根據事實涵蓋二個以上之司法機關，當事人得依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3項請求各級法院組織上所歸屬之司法院（我國司法院組織法第6條）確定賠償義務人，以避免程序之複雜化²⁵⁶。

肆、結論

民事程序上之適時審判請求權，一方面係我國憲法第16條所保障程序基本權的重要內涵，並受在我國有法效力之公政公約第14條

254 參見董保城、湛中樂（註128），頁195。

255 相對於此，我國刑事補償法因屬無過失補償，而不需具體判定審判法官有無違法行為，即得以宣告無罪或不受理判決之法院為管轄（同法第9條第1項）及支付補償金（同法第28條第1項）之主體。

256 參見葉百修（註55），頁294-295。

第1項所確認，另一方面，法院審判不得逾越適當期間一事亦屬於法治國原則對司法權運作的要求。於此項基本權或憲法要求遭受侵害或未獲滿足的情形，縱行為主體係負擔保護訴訟權或提供權利救濟之任務的司法機關，我國憲法第16條、法治國原則及公政公約第2條第3項均指向一個有效的救濟機制，亦即：或應藉由事前的作為請求以防止侵害之發生，或應透過事後的復原請求以彌補侵害之結果。依此，於審理期間之經過將導致系爭實體基本權的減損或喪失，而無從藉由事後救濟予以矯治者，應承認當事人得對程序的停擺提起不作為抗告以謀求事前之預防。然而，不作為抗告本身亦容易造成程序進一步的拖延，且欠缺要件及效果上的明確規定，至少在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上不能被認為係屬有效之救濟途徑，故一個事後彌補的手段即屬必要，此時，應優先考慮我國憲法第24條所要求的國家賠償制度。

為使適時審判請求權之侵害或適時審判要求之違背獲得有效的事後救濟，應對我國國家賠償法為合憲且合（公政）公約的解釋，總結而言：第一，可能用以正當化國家賠償法第13條所定審判官特權之理由（即：維護審判獨立與確保法安定性），並不適用於法院審理活動未於適當期間內完成的情形，蓋其並不涉及審判職務之核心且無關裁判之正確性。第二，藉由對審判是否延滯的「整體」及「個案」評價，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所定之「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兩要件同時在以下意義上得到審查，即：法院程序是否過長的判斷係以（1）案件之複雜程度、（2）當事人就系爭案件所牽涉之利害關係、（3）當事人及（4）該管公權力之行為態樣作為標準，因此，如司法機關執行職務並未違反其程序促進義務，即難認定審判遲延之存在。第三，於前二要件該當的前提下，國家賠償法尚以行為人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為條件，然而，如已確認法院指揮、管理程序牴觸適時審判義務，即得依「過失客觀化」理論逕行認定法院之主觀可歸責性，或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

書轉由被告機關舉證其「無過失」，此並不因義務主體係個別審判法官、法庭、其所屬機關或上級司法機關而有所不同。第四，當事人因程序之過度冗長而受有財產上損害者，依國家賠償法第5條適用我國民法第216條之規定，固應予以賠償，惟就當事人因此所主要蒙受的非財產上損害（即：精神不安、恐懼、沮喪或不適等心理上效果），為避免基本權侵害之救濟的漏洞，亦宜加以補償，而不準用我國民法第18條第2項、第195條等慰撫金限制規範。第五，此一事後救濟之程序，亦不應對適時審判請求權受侵害之人加諸不當之負擔，故宜活用國家賠償法第9條第3項以確定賠償義務機關，國家賠償訴訟並應在適當期間內完成。

法院遲延審判如何透過我國現行法之解釋適用得到救濟，已如上述。作為接續的課題，應在立法論的層次上研究：如何健全我國司法不法國家責任之規範²⁵⁷，並使因紛爭解決之延滯而蒙受不利益之當事人能更容易地獲得適當彌補²⁵⁸？就此，前述外國法及國際法的經驗實值作為我國立法上的借鏡。此外，在促進程序不具絕對價值的認知上，亦必須探討：如何一般性地降低需要救濟不適時審判的情形以防患於未然？亦即，如何廣泛地確保程序之迅速性？就此，除了有賴個別法院合義務地行使現行法所賦予之職權外²⁵⁹，尚應持續整備既有制度²⁶⁰；為此，一個揭露法院程序延宕之背景事實

257 參見范文清（註61），頁51-53對於我國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第5條之評論。

258 參見沈冠伶（註17），頁97對於德國法院組織法第198條以下補償規定之積極評價；認為我國國家賠償法第2條應改採「無過失」之「適度賠償」責任者：陳清秀（註171），頁200。

259 主張我國民事訴訟法上有關促進訴訟之規定亦具有法曹倫理規範之性質，相當具有啟發性者：邱聯恭，民事訴訟法修正之法曹倫理重建機能——立足於其理論思想背景之省思（下），月旦法學雜誌，144期，頁160-166（2007年）。

260 就德、法促進訴訟制度的現狀與展望：參見Norbert Gross, Der schnelle und der kurze Prozess, in: Schulze (Hrsg.),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in Vielfalt geeint, 2014, S. 105; François Staechelé, La célérité de la justice – Approche juridique et pratique, in: Schulze (Hrsg.),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in Vielfalt geeint, 2014, S. 115.

的實證研究即屬必要²⁶¹。

261 例如：參見 *Johannes Kедers/Frank Walter, Langdauernde Zivilverfahren – Ursachen überlanger Verfahrensdauern und Abhilfemöglichkeiten*, NJW 2013, S. 1697。就德國民事訴訟期間的實證研究；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超過一半的研究對象（截至2009年一個審級的終結時間逾越24個月者）有變更法官的情形，平均每次法官的變更會導致訴訟延長3.8個月，此事並伴隨著訴訟資料（卷證之頁數）的增加與期日的改定，該文作者認為此應在人事管理層面上謀求解決之道；在我國，法官法及配套之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實施後，成效如何，實值研究。

參考文獻

1. 中文部分

- Eckart Klein著，王士帆譯（2015），「歐洲人權公約」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際人權保障的基柱，月旦法學雜誌，238期，頁275-282。
- Thomas Groß著，林明鏘譯（2011），歐洲共同體法對德國國家責任法之影響，月旦法學雜誌，188期，頁70-80。
- 王必芳（2013），概述法國法上的「審判法官特權」，台灣法學雜誌，221期，頁54-61。
- 王自雄（2010），人權兩公約之國內法化暨其施行法之實施——從國際法的內化與人權在我國憲政體制下之法律地位論起，台灣法學雜誌，164期，頁113-122。
- 王澤鑑（2005），損害概念及損害分類，月旦法學雜誌，124期，頁201-212。
- （2012），人格權法，臺北：自版。
- 何賴傑（2014），訴訟迅速原則之具體實踐——以德國刑事訴訟晚近發展為例，月旦法學雜誌，229期，頁46-62。
- 吳庚（2004），憲法的解釋與適用，3版，臺北：自版。
- （2007），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增訂10版，臺北：三民。
- 吳從周（2007），民事法官懈怠案件之進行與當事人之權利救濟——從德國「不作為抗告法」（Untätigkeitsbeschwerdengesetz）之制定思考我國法之出路，台灣本土法學雜誌，100期，頁34-57。
- 李建良（1997），基本權利理論體系之構成及其思考層次，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9卷1期，頁39-83。
- （2011），公法上權利的概念、理論與運用，月旦法學教

室，99期，頁20-40。

—— (2014)，論國際條約的國內法效力與法位階定序——國際條約與憲法解釋之關係的基礎課題，收於：廖福特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八）（上冊），頁175-275，臺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李惠宗（1990），「體系正義」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探討——以釋字第2二八號解釋為素材，憲政時代，16卷2期，頁26-40。

沈冠伶（2012），民事訴訟之適時審判與案件管理，收於：程序保障與當事人，頁59-98，臺北：元照。

—— (2012)，訴訟權保障與民事訴訟——以大法官關於「訴訟權」之解釋為中心，收於：訴訟權保障與裁判外紛爭處理，2版，頁1-61，臺北：元照。

林明昕（2016），基本國策之規範效力及其對社會正義之影響，臺大法學論叢，45卷特刊，頁1305-1358。

林明鏘（2015），職務監督與審判獨立，法學叢刊，240期，頁1-43。

法治斌、董保城（2012），憲法新論，5版，臺北：元照。

邱聯恭（2005），程序利益保護原則，收於：程序利益保護論，頁1-80，臺北：元照。

—— (2007)，民事訴訟法修正之法曹倫理重建機能——立足於其理論思想背景之省思（下），月旦法學雜誌，144期，頁152-170。

—— (2015)，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一），臺北：自版。

姜世明（2009），民事程序之武器平等原則，收於：民事程序法之發展與憲法原則，2版，頁161-189，臺北：元照。

—— (2009)，民事程序法發展之憲法因素考量，收於：民事程序法之發展與憲法原則，2版，頁1-51，臺北：元照。

—— (2016)，民事訴訟法（上冊），修訂5版，臺北：新學林。

范文清（2013），論法官與檢察官的國家賠償責任，台灣法學雜

- 誌，221期，頁27-53。
- 孫迺翊（2016），無障礙／可及性、合理調整與平等不歧視原則：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檢視我國憲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平等原則內涵，臺大法學論叢，45卷特刊，頁1163-1228。
- 孫森焱（2014），民法債編總論（上），臺北：自版。
- 翁岳生（2008），西德一九八一年國家賠償法之研究——中德國家賠償制度之比較與檢討，收於：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頁105-140，臺北：元照。
- （2009），行政法與國家賠償法，收於：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頁155-214，臺北：元照。
- 張文貞（2009），憲法與國際人權法的匯流——兼論我國大法官解釋之實踐，收於：廖福特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六）（上冊），頁223-272，臺北：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 張永健、李宗憲（2015），身體健康侵害慰撫金之實證研究：2008年至2012年地方法院醫療糾紛與車禍案件，臺大法學論叢，44卷4期，頁1785-1843。
- 許士宦（2006），民事訴訟上之適時審判請求權，收於：審判對象與適時審判，頁1-72，臺北：新學林。
- （2012），不當得利返還訴訟中無法律上原因事實之舉證責任分配，收於：爭點整理與舉證責任，頁191-252，臺北：新學林。
- 許志雄、陳銘祥、蔡茂寅、周志宏、蔡宗珍（2008），現代憲法論，4版，臺北：元照。
- 許育典（2013），憲法，6版，臺北：元照。
- 許宗力（1999），基本權程序保障功能的最新發展——評司法院釋字第488號解釋，月旦法學雜誌，54期，頁153-160。
- 陳敏（2016），行政法總論，9版，臺北：新學林。
- 陳清秀（2007），國家賠償實務之研討（上），月旦法學雜誌，141

期，頁171-207。

程明修(2007)，第一次權利保護優先原則，法學叢刊，52卷4期，頁27-46。

黃昭元(2011)，國際公法課程基準的檢討與反思：國際法法源、國際法與內國法關係，台灣法學雜誌，181期，頁61-66。

——(2015)，2014年憲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44卷特刊，頁1395-1437。

葉百修(2012)，國家賠償法之理論與實務，4版，臺北：元照。

董保城、湛中樂(2005)，國家責任法——兼論大陸地區行政補償與行政賠償，臺北：元照。

廖福特(2010)，法院應否及如何適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台灣法學雜誌，163期，頁45-65。

潘怡宏(2012)，論最高法院反覆發回更審實務之違憲問題，台灣法學雜誌，207期，頁72-101。

蔡志方(1993)，從立法裁量權之界限，論國家賠償法第十三條之合憲性，收於：行政救濟與行政法學(二)，頁287-299，臺北：三民。

蕭文生(2000)，基本權利侵害之救濟，收於：李建良、簡資修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二)，頁471-496，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2013)，國家賠償責任之歸責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836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21期，頁87-95。

——(2015)，裁量萎縮至零與怠於執行職務——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711號民事判決，法令月刊，66卷3期，頁1-22。

2. 外文部分

Althammer, Christoph (2011), Schmerzensgeld wegen überlanger Dauer von Zivilverfahren: Bemerkungen zum künftigen deutschen Entschädigungsmodell, JZ, S. 446-453.

- Barczak, Tristan (2015), Normenkonkurrenz und Normenkollision, JuS, S. 969-976.
- Blomeyer, Jürgen (1977), Die Haftung des Staates für die Verzögerung von Zivilprozessen, NJW, S. 557-561.
- Bolard, Georges (1993), Les principes directeurs du procès civil : Le droit positif depuis Henri Motulsky, JCP, éd. G, I, 3693.
- Braun, Johann (2007), Restitutionsklage wegen Verletzung der Europäischen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NJW, S. 1620-1622.
- Brehm, Wolfgang (2014), in: Stein/Jonas (Hrsg.), Kommentar zur Zivilprozessordnung, Bd. I, 23. Auf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Einl.
- Breuer, Marten (2011), Staatshaftung für judikatives Un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 (2015), in: Karpenstein/Mayer (Hrs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EMRK, 2. Aufl., München: C. H. Beck, Art. 13.
- Brüning, Christoph (2007), Staatshaftung bei überlanger Dauer von Gerichtsverfahren, NJW, S. 1094-1099.
- Cadiet, Loïc, Jeuland, Emmanuel (2013), Droit judiciaire privé, 8^e éd., Paris: LexisNexis.
- Canaris, Claus-Wilhelm (2012), Die verfassungskonforme Auslegung und Rechtsfortbildung im System der juristischen Methodenlehre, in: Grigoleit/Neuner (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I, Berlin: De Gruyter, S. 581-598.
- Debbasch, Charles (2001), Le nouveau régime de responsabilité de la justice, Recueil Dalloz, 1752.
- Di Fabio, Udo (2013),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Stand: 70. EL 2013, München: C. H. Beck, Art. 2.

- Dietrich, Michael (2014), Rechtsschutz wegen überlanger Verfahrensdauer nach §§ 198 ff. GVG, ZZP 127, S. 169-201.
- Fricero, Natalie (2012), Garanties de nature procédurale: équité, célérité et laïcité, in GUINCHARD (S.), Droit et pratique de la procédure civile. Droits interne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7^e éd., Paris: Dalloz.
- Gross, Norbert (2014), Der schnelle und der kurze Prozess, in: Schulze (Hrsg.),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in Vielfalt geeint, München: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S. 105-114.
- Grzeszick, Bernd (2013),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I, Stand: 70. EL 2013, München: C. H. Beck, Art. 20, VII.
- Guinchard, Serge, Chainais, Cécile, Delicostopoulos, Constantin S., Delicostopoulos, Ioannis S., Douchy-Oudot, Mélina, Ferrand, Frédérique, Lagarde, Xavier, Magnier, Véronique, Ruiz Fabri, Hélène, Sinopoli, Laurence, Sorel, Jean-Marc (2013), Droit processuel. Droits fondamentaux du procès, 7^e éd., Paris: Dalloz.
- Guinchard, Serge, Chainais, Cécile, Ferrand, Frédérique (2012), Procédure civile: Droit interne et européen du procès civil, 31^e éd., Paris: Dalloz.
- Hennebel, Ludovic (2007), La jurisprudence du Comité des droits de l'homme des Nations Unies: Le Pacte international relatif aux droits civils et politiques et son mécanisme de protection individuelle, Bruxelles: Bruylant.
- Herdegen, Matthias (2013),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Stand: 70. EL 2013, München: C. H. Beck, Art. 1 Abs. 3.
- Hess, Burkhard (2005), Staatshaftung für zögerliche Justiz – ein deutsch-österreichischer Rechtsvergleich, in: Bittner/Klicka/Kodek/

- Oberhammer (Hrsg.), Festschrift für Walter H. Rechberger zum 60. Geburtstag, Wien/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S. 211-226.
- Hillgruber, Christian (2013),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X, Stand: 70. EL 2013, München: C. H. Beck, Art. 97.
- Idoux, Pascale, Milano, Laure (2007), Aspects du droit à un procès équitable, Juris-Classeur Libertés, Fasc. 1520.
- Jauernig, Othmar/Hess, Burkhard (2011), Zivilprozessrecht, 30. Aufl., München: C. H. Beck.
- Keders, Johannes/Walter, Frank (2013), Langdauernde Zivilverfahren – Ursachen überlanger Verfahrensdauern und Abhilfemöglichkeiten, NJW, S. 1697-1704.
- Kischel, Uwe (2015), Rechtsvergleichung, München: C. H. Beck.
- Larenz, Karl/Canaris, Claus-Wilhelm (1995),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1960), 3. Aufl., Berlin/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
- Leipold, Dieter (2005), in: Stein/Jonas (Hrsg.), Kommentar zur Zivilprozessordnung, Bd. III, 22. Auf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Vor § 128.
- Lipp, Volker (2015), Rechtsschutz gegen den Richter, in: Münch (Hrsg.), Prozessrecht und materielles 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S. 201-210.
- Mayer, Franz C. (2015), in: Karpenstein/Mayer (Hrs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EMRK, 2. Aufl., München: C. H. Beck, Art. 6.
- Menuret, Jean-Jacques (2001), Compatibilité du régime spécial de responsabilité de la puissance publique de l'article L. 781-1 du Code de l'organisation judiciaire avec l'article 6 de la Convention EDH et redéfinition de la notion de faute lourde, JCP, II, 10583.

- Meyer, Frank (2015), in: Karpenstein/Mayer (Hrsg.), Konvention zum Schutz der Menschenrechte und Grundfreiheiten: EMRK, 2. Aufl., München: C. H. Beck, Art. 6.
- Meyer-Ladewig, Jens (2011), Europäische Menschenrechtskonvention, 3. Aufl., Baden-Baden: Nomos, Art. 6, 13, 41.
- Muckel, Stefan (2014), Amtshaftungsansprüche nach überlanger Dauer eines Gerichtsverfahrens, JA, S. 398-400.
- Neuner, Jörg (2013), Das Schmerzensgeld, JuS, S. 577-585.
- Oetker, Hartmut (2012), in: Krüger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d. II, 6. Aufl., München: C. H. Beck, § 253.
- Ossenbühl, Fritz (1998), Staatshaftungsrecht, 5. Aufl., München: C. H. Beck.
- (2007), Anmerkung zu BGH, Urteil v. 11.1.2007 – III ZR 302/05, JZ, S. 690-691.
- Papier, Hans-Jürgen (2001), Die richterliche Unabhängigkeit und ihre Schranken, NJW, S. 1089-1094.
- (2013), in: Habersack (Hrs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d. V, 6. Aufl., München: C. H. Beck, § 839.
- (2013),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I, Stand: 70. EL 2013, München: C. H. Beck, Art. 34.
- Redeker, Konrad (2003), Verfahrensgrundrechte und Justizgewährungsanspruch, NJW, S. 2956-2958.
- Reiter, Harald (2015), Die Rechtsnatur des Entschädigungsanspruchs wegen unangemessener Verfahrensdauer, NJW, S. 2554-2559.
- Remus, Dieter (2012), Amtshaftung bei verzögerter Amtstätigkeit des Richters, NJW, S. 1403-1409.
- Rixe, Georg (2010), Effektiver Rechtsschutz gegen überlange

- Gerichtsverfahren – Zugleich eine Kritik des Regierungsentwurfs, FamRZ, S. 1965-1970.
- Roller, Steffen (2008), Möglichkeiten des Gesetzgebers zu einer Beschleunigung gerichtlicher Verfahren, ZRP, S. 122-123.
- Rüthers, Bernd/Fischer, Christian/Birk, Axel (2015), Rechtstheorie, 8. Aufl., München: C. H. Beck.
- Sabourault, Didier (2003), La fonction juridictionnelle entre autorité, indépendance et responsabilité, in DEGUERGUE (M.), Justice et responsabilité de l'État, pp. 172-208, Paris: PUF.
- Sauer, Heiko (2012), Staatshaftungsrecht, JuS, S. 695-699.
- (2012), Staatshaftungsrecht, JuS, S. 800-805.
- Schilling, Theodor (2010), Internationaler Menschenrechtsschutz, 2. Auf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 Schmidt-Aßmann, Eberhard (2013), in: Maunz/Dürig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Bd. I, Stand: 70. EL 2013, München: C. H. Beck, Art. 19 Abs. 4.
- Schoibl, Norbert A. (2005), in: Fasching/Konecny (Hrsg.), ZPO, Bd. 4/1, 2. Aufl., Wien: Manz, Vor § 461 Anh.
- Schulze-Fielitz, Helmuth (2006), in: Dreier (Hrsg.), GG Kommentar, Bd. II, 2. Auf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Art. 20.
- Staechelé, François (2014), La célérité de la justice – Approche juridique et pratique, in: Schulze (Hrsg.), Europäisches Privatrecht in Vielfalt geeint, München: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S. 115-124.
- Steinbeiß-Winkelmann, Christine (2007), Überlange Gerichtsverfahren – der Ruf nach dem Gesetzgeber, ZRP, S. 177-180.
- (2014), Amtshaftungsansprüche wegen überlanger Verfahrensdauer, NJW, S. 1276-1278.
- Steinbeiß-Winkelmann, Christine/Sporrer, Tim (2014), Rechtsschutz bei überlangen Gerichtsverfahren, NJW, S. 177-182.

- Strickler, Yves (2007), Délai raisonnable de jugement, Juris-Classeur Libertés, Fasc. 1540.
- Sudre, Frédéric (2007), Droit international et européen des droits de l'Homme, Juris-Classeur Libertés, Fasc. 55.
- Treber, Jürgen (2005), Neuerungen durch das Anhörungsrügensgesetz, NJW, S. 97-101.
- Uhle, Arnd (2013), Rechtsstaatliche Prozessgrundrechte und -grundsätze, in: Merten/Papier (Hrsg.), Handbuch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Bd. V, Heidelberg: C.F. Müller, § 129.
- Voßkuhle, Andreas (1995), Erosionserscheinungen des zivilprozessualen Rechtsmittelsystems, NJW, S. 1377-1384.
- (2003), Bruch mit einem Dogma: Die Verfassung garantiert Rechtsschutz gegen den Richter, NJW, S. 2193-2200.
- Voßkuhle, Andreas/Kaiser, Anna-Bettina (2014), Grundwissen – Öffentliches Recht: Der allgemeine Justizgewährungsanspruch, JuS, S. 312-314.
- Waldhoff, Christian (2008), Amtshaftung – Enteignungsgleicher Eingriff wegen Verzögerung von Eintragungen im Grundbuch, JuS, S. 645-647.
- Wolf, Wilhelm (2011), Amtshaftung wegen überlanger Verfahrensdauer eines Zivilprozesses, LMK, 317778.
- Wöstmann, Heinz (2012), in: Staudinger (Hrsg.),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Neubearbeitung 2012, Bd. II, Berlin: Sellier-de Gruyter, § 839.
- Zuck, Rüdiger (2013), Die Gewährleistung effektiven Rechtsschutzes im Zivilprozess, NJW, S. 1132-1135.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Right to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nd Its Remedy:

On State Liability for the Excessive Length of Civil Proceedings

*Wei-Yu Chen**

Abstract

As a human right, the fundamental procedural right guarantees that the parties are entitled to a final decision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which is also derived from a constitutional requirement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This assertion corresponds also to regu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such as Art. 6 I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r Art. 14 of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infringement of this right, a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confirm, should give rise to an effective remedy,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actor violating the time requirement exercises judicial power and therefore demands more or less a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regarding the need for independence. However, differing from other kinds of breaches of procedural rights, an effective remedy for the excessive length of proceedings, by its nature, can only be sought in prevention during pending processes or be monetarily compensated *ex post*. As a result, with respect of Taiwanese civil procedural law, it should be studied whether and how a complaint of failure to act functions and to what extent the State Compensation Law serves the stated purpose. In view of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follow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case law of the

*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evolution of German state liability law. It aims to provide guidelin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ated Taiwanese law.

KEYWORDS: right to trial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procedural rights remedies, state liability for defective judicial service, judicial privilege, Article 6 I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ECHR).